

【编者的话】

随着中日钓鱼岛冲突升级，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恶感”也进一步深化。许多城市爆发了“反日游行”，且出现了针对日本企业商品的打砸抢违法事件。一时间，日系车不敢上街，4S 店公安坐镇，电视台停播日资企业广告，相机穿五星红旗表红心，日本餐厅推出“保钓套餐”，日系零售商关门避风头。

打砸抢者多声称“如果中国人都不买日本产品，日本经济就会崩溃，砸光日系产品让他们无钱可赚”，然而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没有国家是一座孤岛。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双方经贸合作极其活跃，早已是共生互赖的关系。在沉重历史包袱下，我们该如何面对日本，如何定位中日关系，或许是这团乱象中绕不过的问题。本期 1510 周刊，我们尝试还原真实的中日关系。

作家李海鹏在《日本在中国的真实存在》一文中，叙写了两国合作密切的宏大背景下更为细微、复杂的存在，和两国人对彼此微妙的心态。加藤嘉一和刘柠则各自假设命题，从本国出发，书写失去对方国家的祖国会是何种模样。“对中国来说，如果放大仇恨，对日本过多‘误读’，只能伤害自己，同样，如果日本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复杂性，也将伤害其自身。”

中日两国人眼中的彼此究竟是什么样子？旅日作家李长声的《日本的形与型》一文，道出了在日本生活二十多年来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日本人讲究形式，简直讲究得做作而令人厌烦。能剧的过程、插花的结果、剑道的招式、敬语的说法及国民的品性，都具有形或型，成形而定型。‘形’或‘型’是日本文化的关键词。”长期在中国生活工作的演员矢野浩二则从生活的小细节——拜托他人时说什么——娓娓道来他的两国观感。

资中筠先生在《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一文中，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我们了解日本吗？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及得上日本对我们的认知吗？当“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宋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的时候，又有多少中国人对日本有这样细腻的知识？赵楚在《假如甲午战争重新来过》中提出，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文明、制度和社会发展竞争才是核心的。杨潇和黄广明的《文化中国可以治疗“中国恐惧症”》，采访早稻田大学中国研究学者依田熹，从教育、政治、文化复兴、现代化几个方面对比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沿袭和未来展望，依田教授指出，“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是选拔优秀的孩子对他们进行教育，这听起来不错，但还是有很多缺陷。什么叫优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日本人的想法是，不管你的素质如何，教育都是必须的，这种想法是根深蒂固的。”

要探讨中日“过山车”般扑朔迷离的关系，就免不了要说起两国之间沉痛血腥的历史。袁伟时先生的《从后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看冲突与融合》以友人对谈的方式，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国人对中日关系的几个常见观点做了条理明晰的回应。而学者张少锋的《中日之身份政治》另辟蹊径，从两国国民身份认同这个角度，分析身份讲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面前目前的困境，他认为“破解这种认同危机，需要双方的重新自我定位与再现。需要行为体对环境、自我与他者的再认识，以及行为体间的自我约束与良性互动。”

最后，我们选取了余杰先生十年之前的作品《铁与犁》中最后一章作为本期周刊的结尾。“悠久的历史只有成为反思的资源时，才是值得宝贵的财富；深重的苦难只有成为奋起的动力时，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中日关系是一个太大太广的话题，面对这些问题时，不妨不急着选一个立场，表一个态度，而是耐心、理性地多留一些时间去理解、包容以至宽恕。就好像有人说的，在声讨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耻行径之后，也不会忘记回家去听听小泽征尔的音乐；在痛斥石原慎太郎的反华言论之后，也还会去翻翻村上春树的小说。

1510周刊由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论】

11-1 李海鹏：日本在中国的真实存在

“在北京，人们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忙碌数倍不止；在东京，女孩们人手一只法国皮包。中日两国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不，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就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才是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



在1980年代，由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导的对日政策以开明豁达为特征，两国之间虽偶有龃龉，关系始终还算良好。其时“中日友好”是主旋律，而《血疑》等电视剧风行中国，山口百惠更成为两国共同的偶像。这一政策的核心，来自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访日之旅中会见日本天皇时的友善表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政论家马立诚说：“没有人比邓小平更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他是曾经的抗日将领。”过去几年中，中日关系却经历了寒冬。如今，“暖春”似乎又来。最重要的事实则是，在政治层面的不停顿的变化当中，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和影响已蔚为大观。

既广泛，又不够深入

在 21 世纪中国，日本文化是最值得贩售的软性商品之一。从陶瓷洁具、游戏机到芥末豆，日本商品总是附带着生活方式，催生着中国的亚文化。2007 年，中日两国贸易额达到 2366 亿美元，与 817 座鸟巢体育场等值。中日两国的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都不能缺少来自对方的商品，

这些公司本身往往也彼此关联。日本百货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最近有所削弱，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仍然清晰——到沃尔玛购物的人们各形各色，但是“最具时尚号召力的百货店”伊势丹的顾客们却有着清晰的一致性。

资生堂化妆品深受中国年轻女性的推崇，欧珀莱则享受不到同等美誉度，其实两者属一公司，仅因表面上日本风格的多寡，便决定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日流”早已不局限于青少年当中。在大连和青岛，日语被很多学校当作第一外语。日本料理店在全中国的城市中星罗棋布，前往苏州高新技术区的“日本街”享受日本料理的中国顾客至少是日本人的两倍之多。

如今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但作为更准确的经济依存度的指标，两国的相互投资额仍有可提高余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只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 2%左右。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报告称，日本 2007 年对中国内地投资额为 62 亿美元，明显低于台湾“经济部”公布的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额 99.71 亿美元。构成对比的是，日本仅在香港一地的投资就达 76.8 亿美元。

中日交往的特色之一便是，经济、文化不可能像其他国际往来一般“独走”，它们总是严重地附着于政治。2006 年，日本对中国投资首次减少了 4 亿美元，正是因为两国关系走向僵局。而小泉纯一郎前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的执著参拜则重重掀起了两国历史问题的沉疴，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变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并不顺遂的一个显著例证是，享誉世界的日本汽车业，在中国的步伐一度落后于欧美同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到东南亚。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越南物价低廉，越南人对日本持好感，日本企业因此喜欢到越南投资。”

与政治、经济的气候无常相对应的是，文化上的日本雨则不停歇地下了 36 年。“我师兄小时候看《机器猫》，我小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北京寒山漫画社的刘靖瑶说。如今，凡 40

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按照童年时代接触过什么日本动漫产品而被划分为不同代际。可是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态度又并不是只有喜欢而已。“该如何理解今日如此复杂的中国呢？”小野千重子问道。她曾作为日本的国际协力组织成员在北京、安徽等地服务了将近 3 年。

在安徽省，他们援建学校，担任义工。在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她的同僚水谷准感到困惑：为什么校舍如此破败，当地政府却建起了豪华办公楼？他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又一波“恶感”。这一事件中最受忽视的是细节是，日方最终还是拨给杨庄小学 8 万多美元的援助资金。

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时有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地上铺上一块写有“抵制日货”字样的白布，然后弹吉他吸引人们的注意。刘靖瑶也站在这里，身边围拢的年轻人的装扮就像是来自东京。

不过，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虽广泛，却不够深入。1990 年代，在中国的书店里，关于日本企业的出版物不再是热门读物。17 世纪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风俗小说《好色一代男》进入了排行榜，而他更重要的作品，关于商业生活的《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却从没有出现在中国各书店的书架上，尽管町人伦理是日本商业在武士道之外的另一精神源头。

对日研究不够深入，亦是中国的日本学者们的长久苦恼之一。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去世之前遗憾地说：“我因为政治的需要，把能够用在日本史上的有限时间，都去搞了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无法抵制的日本

在今天，一个坚决的日货抵制者可能会遇到的无穷多的困难。“日货”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车和电子产品，钢铁、纤维等日本的大宗出口产品隐藏在无数中国建筑之中，日本化学制品无处不在，而日本制造的医疗器械则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角度来说，一个彻底的日货抵制者甚至无法使用京九铁路、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

据日本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截止到 2004 年度，这一计划(ODA)为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 1457 亿日元，约合 65 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 83 亿元人民币，有偿资金援助约 1651 亿元人民币。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抵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日货抵制者甚至根本就没办法使用手机。“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无论是中国的、瑞典的、美国的还是韩国的，”他说，“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机”这个词也来自日本。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每当他们愤怒地提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就在无知无觉中使用了“日货”——“历史”这个词同样来自日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如此之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各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学”。抵制者们的困难更多地来自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国的很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列队拍手，齐呼企业口号，这一习惯来自日本企业。在路上，人们会看见前面轿车尾部的招贴：“熊出没，注意！”它是来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来品。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经营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药妆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里，盛装的是中国城市女性难以抵挡的日式风格。到了晚上，当某位坚定的抵制者打开电视机时——当然是国产品牌——会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在使用一句有着爱国主义色彩的广告词，“产业报国”，它来自松下电器公司。

日本企业法则在管理经营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度过了起步的艰难时光，不过在中国的风行并不长久。作为国家精英的中国的新贵阶层很快就注意到，在 1990 年后的经济新世界中，美式的创造精神比日式的谆谆教诲更成功，商业偶像从此变成了杰克·韦尔奇和史蒂夫·乔布斯。日本不再是中国的老师了吗？经济生活的细节可不能支持这一点。在北京西单的无印良品店中，中国顾客会面对日本人生产的衣架上的小缺口而暗自叹息：为什么可以替顾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挂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

两个不同的文明

1976 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变得无所不在。但是对中国来说，日本仍是最熟悉的陌生国。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容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与美国人达成沟通，但与日本人的交往却不顺畅。

“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较相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萍曾对媒体说，“实际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相似程度。中国和日本的相似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对此，时尚杂志《安 25ans》的主编宋娟很有共鸣：“我们跟美国人挺像的，好沟通，日本人跟中国人特别不一样。”

宋娟尽力给员工们灌输曾令自己在过去 7 年中受益匪浅的日本工作方式。她推广各种强调细节的流程表、计划、操作规范，甚至到了自己都觉得琐碎和麻烦的程度，杂志运行由此形成了值得欣喜的秩序。不过，当她每隔两个月去日本拍摄一次杂志封面时，则无法回避中日交流中最困难的一面。《安 25ans》在日本时尚工业中雇用人手。“可是我永远没有当老板的感觉，”宋娟说，“与日本人打交道，有时会气得半死。”

今年 1 月，在日本的“井井有条”的拍摄现场——在国内则将是“混乱不堪”的——她第一时间挑选了照片。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当她回国后要求更换一张时，出人意料地，一向表现得谦恭有礼的日本摄影师被激怒了，拒绝更换，质问她为何不讲信用，并表示不再合作。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被区别对待。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与日本也被划作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更多地意味着潜在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在日本国内，皮卡丘形象版权价值每年高达 1000 亿日元。2006 年，日本的动漫产业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 2 兆多日元，占日本 GDP 的十个百分点以上，已经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如果中国少年购买《皮卡丘》正版游戏软件的比率与日本持平，那么它在中国的销售量就会达到惊人的 1500 万套。对于日本文化产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终将达到国际水准的中国将是一个不穷尽的金矿。
可是中国动漫界能不能取得像日本一样的成就呢？这是普通年轻人刘靖瑶也明白的道理：“我们跟日本人不一样。”“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

日本社会是稳定的，中国则在急遽变化。仅仅在三十多年前，情况还恰恰相反，当时日本充满朝气，中国则沉落到死寂之中。十几年来，日本人心目中的新英雄总是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不知二战已经结束而在菲律宾丛林中坚持游击 30 年的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保险推销女王柴田和子和一匹名叫乌拉拉的屡败屡战的赛马，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回事。而中国英雄则是张朝阳、春树、李宇春，他们完全不同，惟一的共同点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里取得了成功。

在现代化之旅中，中国的旅行箱中装着什么？恰如小野千重子所言，日本人该如何理解今日中国？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它们 1970 年代在欧美发展得那么顺畅。从 1992 年八佰伴百货进驻上海浦东开始，日本零售商大批进入中国。伊藤洋华堂、永旺、伊势丹、三越等均在 1996 年前后渡海试水，但十年来，以八佰伴的破产为标志，日本零售商的中国冒险并不成功。巅峰时期，伊都锦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和百货商店达到 26 家之多，但到了 2007 年 8 月，伊都锦

商厦在青岛的门店正式闭店，伊都锦随后结束在华全部百货业务。更早些时候，在日资格外青睐的上海，日本零售业巨头伊藤忠株式会社参与投资的和之百货开业不到半年便停业调整。

日企固然在中国获得利润与发展，比较起来却远不如欧美公司生气勃勃。中科院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当待遇相当的条件下，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欧美企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像欧美人那样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挥潜力，而不愿像日本同事那样忠诚、信义地接受终身雇佣。

在大学里，一般学生们对谷歌中国、微软中国的商业领袖的名字如数家珍，可是索尼在中国的头儿，是谁呢？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得到美国网络公司的搜索引擎上去查一查才行。

与美国企业在中国顺风顺水甚至时常获得道义上的肯定相比，最近 8 年来，日本企业多次陷入了泥沼。2000 年后，东芝笔记本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几次日企危机，引发了媒体的大量批评。从日本人珠海集体嫖妓事件到三菱东京 UFJ 深圳支行一日籍科长殴打中国籍部下事件，一次又一次，历史问题总是会微妙地折射到日企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上面。

马立诚在 2002 年发表《对日新思维》，立刻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攻击”，网民们称其为“汉奸”，甚至将其文章与汪精卫 1938 年的《艳电》并列。有人把辱骂的话写在寄来的信封上，“让沿途的人看”。作者的地址被公布出来。一个被他认为“恶搞”的行动是，有人在网上造出了一个凤凰卫视的播出画面，屏幕上女主播在播报新闻，下方则添加了一条滚动字幕：“本台评论员马立诚今日在香港中环被爱国青年痛殴。”

在 2007 年 4 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后，马立诚才感觉到“受到的攻击明显减轻”。

2004 年和 2005 年，反日情绪正炽，2005 年 4 月导致了上海、北京等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

中国 A，一个理智的、受过较好的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人群反对这种行动，至少反对其行为方式，但是中国 B，另外一个人群，数量庞大而且躁动，冲动行事并一时独揽了国家的形象。

日本 A，了解中国的极小人群，清楚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别，但是日本 B，绝大多数日本人，习惯于把所有中国人都看作是一个人，反之亦然。上海反日示威的次日，拥有 16000 名会员的日本新一代企业家团体“青年会议所”发布了一个紧急调查结果，数据表明有 74%日本企业家对中国“反日情绪”感到不安。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正是近年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于中国社会能否可靠运转，日本各界充满了不信任感。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由此带上了奇怪的色彩。欧美的化妆品公司会给中国记者留下很大的采访空间，可是资生堂公司公关部的工作人员会在采访之前就与记者沟通采访方案，事后又要做勤勉的交流。花王公司在今年年初就筹办媒体见面会，可是 5 个月后仍未召开。对日本企业来说，谨慎再谨慎，是在中国做事的第一要义。

在北京，吉野家餐厅的餐桌上一度多了一个塑料标牌：北京吉野家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著名品牌。这是真的吗？这家供应牛肉饭和糖渍姜片的企业在日本开有一千多家餐厅，是货真价实的日企。吉野家北京公司公关部的一位女孩不接受采访，她说：“这也可以理解吧？”

变化，变化

中国与日本的相互交流从来就不是容易的。20 世纪上半叶最反对日本的中国人，恰恰是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在一生当中，鲁迅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后的墨迹是一张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先赶到他临终的床前的又是三个日本人，他却从来没有留下任何一篇专门论述

日本的文章。周作人喜欢日本，却仍在《日本管窥之四》谴责日本人。成仿吾留日 11 年，却在他关于日本的惟一的一篇文章《东京》中令人惊骇地说：“假使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和火灾。”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曾经是一个扭曲的幻像。山口百惠的电视剧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人们能够“了解”到的日本人只是抗日故事电影中愚蠢可笑的“猪头小队长”。在 1980 年代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中，只有凭借阴谋，无能的日本人才能摧毁中华英雄。更早的 20 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对日本的诋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嫖遍日本女人”这样的说法也只是其中之一。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 35 年来致力于中日民众间的交流，不过要取得成效，看上去还需要更久的时间。

棋手聂卫平去过七十多次日本，有众多的日本朋友，喜欢日本饮食，一次吃 5 盘生鱼片，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他不赞成反日游行，但是他至今无法原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那是滔天罪行”。当他的儿子孔令文娶了小林清芽时，即便儿媳的父亲是他的老友日本棋手小林觉，他仍然说：“可惜娶的不是中国媳妇。”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家里的两个亲人死于日军之手。

两国试图沟通彼此的立场。2006 年 11 月，中日外长在 APEC 会议上确定，各派 10 名学者进行两国历史共同研究。不过有美国学者对此并不乐观：中国的有官方色彩的学者与日本的有右翼色彩学者坐在一起难免话不投机。

如今，情况又一次转好。今年 5 月 4 日，胡锦涛在出发访日前接受了日本 16 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在采访中，这位很少给外国记者采访机会的、严格控制自己公众形象的领导人提及了当年访日时的往事。

《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一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全篇报道中没有提起“以史为鉴”。

向前看，有可能又一次成为主流思路。在政治改革层面亦是如此。早在 1980 年代，中国就有学者关注到日本的政治模式。在日本，从 1955 年起，53 年中只有 1993-1996 年的 3 年间例外，其他时间都是由自民党执政。马立诚说，日本政治的特点是，一、一党长期执政下的多党格局；二、执政党内部分成派系。中国学者考虑借鉴日本模式，以为蓝本，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在中国，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远非显学，可是出版的图书已经不下十余种。

在北京，人们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忙碌数倍不止；在东京，女孩们人手一只法国皮包。中日两国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不，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就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才是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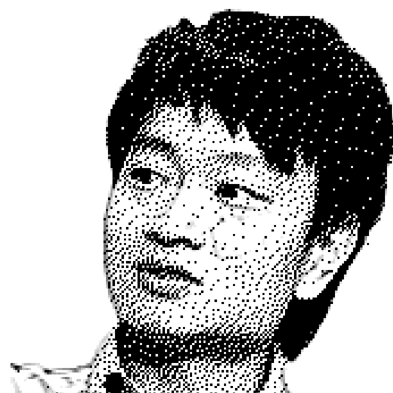
于是一切都又回到多年以前的主题了：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中日关系的“暖春”又有了回归 1980 年代的征兆。最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中国国内。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孙中山改变中国时的起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同样地，再次回到了胡耀邦思路的原点。

“要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1983 年 11 月，胡耀邦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演讲说：“眼光放长，达人大观。”

（李海鹏，作家，已出版《佛祖在一号线》、《大地孤独闪光》、《晚来寂静》。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01/4）

【返回目录】

11-2 加藤嘉一：假如日本失去中国



“■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进口粮食，导致恶性循环。

■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

■右翼媒体，假如失去“中国”，就会立刻倒闭。

■正是由于有中国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5月2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除非发生特殊情况，我会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也想参考一下。”

石原都知事今年 1 月接受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邀请，就已经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而当西藏问题引起不和谐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发生，很多日本政治家迎合国际舆论时，石原仍坚持到访北京，确实是 180 度地改变了他一贯的“对华强硬”。

毋庸置疑，石原需要为东京申办 2016 年奥运会争取更多的支持，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石原从“日本必须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出发的政治策略。中日两国的首都北京、东京之间的“政治博弈”背后，正是全方位相互依存的中日关系。这一点，连日本右翼的代表性人物石原慎太郎也不能忽视，也不能轻易反华了。

“日本会死亡吧”

“不能生活了！不能去学校了！不能刷牙！没衣服和鞋子穿！没手表，看不了时间了！不能用 iPod 听音乐，也看不了电视了！不能吃食堂的沙拉了！街上的灯光是中国制造的，（没有中国）东京就暗了，认不出店了！生活没有电脑了！也没有手机了，因为充电器是中国制的！”

佐藤明在东京工作 30 年，在他看来，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跟他持有同样想法的老百姓不少。最近在日本，有一个概念特别流行，即“格差（Kakusa）”，指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距”，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格差”是收入的差距。日本社会与中国一样，同样面临着“贫富差距”问题，而正逐步被边缘化的低收入群体，恰恰是最离不开“中国制造”的。

“如果中国产品消失，生活应该难以为继了。有钱人还可以，他们能承受高价格的压力，但更多的老百姓将遭到巨大的困难，包括我。”在大阪某所高中教书的和田老师说。

生活难以继续的背后，是日本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日本会死亡吧。”高盛集团分析员德田这样描述中日经贸联系中断后可能的情形，“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从国外进口对老百姓来说最迫切的粮食和食品，导致恶性循环。”

“企业将受到巨大打击”，面对“如果日本失去中国”的命题，这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年轻人对此命题的第一反应。

“对日本而言，中国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廉价的加工厂，更是正在成型的巨大消费市场，它为确保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曾经在北京大学研究日本问题，目前是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分析员朱晖说，“中日经济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与协作的空间，在产品、

产业结构、技术、市场等等多方面都是如此。由于面对着北美、欧洲两大经济共同体的强烈挑战，日本如果无法与中国构成共同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是相当令人担心的。”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最新发布的《2007 中日贸易》报告，2007 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进出口（包括香港）占总贸易额的 20%以上。在华日本企业超过 2 万家，雇用的员工总数大约 1000 万人。“日本离不开中国”这一说法，也许中国人更愿意听到，但是，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需求，恐怕确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假如日本的“舆论”失去中国

假如日本的“舆论”失去了中国，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今天日本的“舆论过程”或多或少受着“中国因素”的影响。

日本的政界，无论对中间偏右的、偏左的，还是极右的、极左的、中立的，对每一个派阀或政客来说，“中国因素”确实是一个“卖点”。对“中国”不表示“立场”，基本不现实。绝对的反华，在日本似乎已经不是“主流”，但对华强硬派，就是汉语中说的“右翼势力”依然存在，并与“亲华”势力抗衡，大造对华舆论。

今天日本政界的“对外战略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巩固日美同盟的同时，搞好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主流；第二，放弃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对中国也保持强硬，成为拥有正式军队的“普通国家”；第三，与美国拉开距离，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三种观点，都与中国因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换言之，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

媒体就更需要“卖点”。无论是报纸、杂志、电视还是图书，“中国问题”已经形成巨大的市场。对日本媒体来说，如何抓住读者、观众的“心意”是最迫切的任务。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众多：政治、安全、历史等问题直接涉及到民族情绪，经济、食品、卫生等问题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民众对“对华报道”的关注度相当高。在这样情况下，媒体出于利益至上的考虑，常常做出煽动性报道。媒体越煽动，民众越关注，而民众越关注，媒体越煽动。

“尤其就右翼媒体而言，只要用上‘中国’一词，读者就会买。他们是靠‘中国’生存的。假如失去了中国，他们就会立刻倒闭。”日本某家杂志的编辑说。

同样，对日本的文化出口来说，中国也是最有潜力的市场。由于知识产权等问题存在，两国文化产业之间的顺畅、健全的交流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它客观上对推进日本的“软实力”，具有战略价值。日本出产的文化产品，中国人基本上都可以接受，西方人却只对其中一小部分产生兴趣。许多日本电视剧的观众、日本小说的读者、日本电玩在中国有多少粉丝，假如失去这些粉丝，那么日本的多数文化产品都将失去大部分受众，成为只有日本人自娱自乐的东西。

“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少有的真正能对日本的文化产生共鸣的国家，两国的历史与文化交流，决定了双方都已经成为对方文化的最好诠释者。或者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朱晖说。

“日本不能承受失去中国的压力。这个题目本身，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假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周陶沫说。

我们日本人做了多少准备？

不过，难道日本真的不能失去中国了吗？

在全球化背景下，“未知数”日益增加，今天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要提出来：

日本今后真的能够有效引进中国的人才、资金等资源，并使得两国关系更加长久吗？日本的企业文化能接受个性相当强的中国员工吗？中国员工愿意进入要求集体主义的日本企业吗？日本人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早晚要大量引进海外的劳动力？心理准备好了吗？

有部分日本媒体预测：“不等北京奥运，中国经济泡沫就已经开始崩溃。”5 月 3 日的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也提出了“覆盖中国的 5 个风险”，包括“低成本中国”的终结、投资依存的经济增长、扩大的贫富差距、高龄化以及日益深化的环境问题。那么，中国市场的泡沫会破吗？中国社会能持续保持稳定状态吗？

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对日本影响巨大。也正因此，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日本大企业已经开始落实“China+1”或“脱中国”政策，即把生产基地的一部分转移到越南等国家。我们会不会因为上述问题分析、处理得不恰当，而失去中国呢？

笔者 2003 年来到中国，其间多次体验到，两国民众的感情隔阂是多么地深远。2005 年的“反日游行”、今年的“毒饺子事件”以及“西藏事件”，使不少日本人毫不犹豫地觉得“中国很危险”。2007 年日本大约 400 万人次到访中国，而中国至日本也大约有 125 万人次，两国之间的人际来往这么频繁，而民众之间的相互意识却这么遥远，这是今天中日民间关系“相对的真实”。那么，中日民众的民族情绪真的不会“爆发”吗？两国之间的“民意”严重恶化后，政府之间还能展开灵活的外交吗？

无论是东海油田问题还是钓鱼岛，两国政府绝不可能轻易妥协。中日真的不会因为主权领土等敏感问题而陷入危机吗？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多么地长远、艰难，媒体或民众能以耐心看待这些吗？

更进一步说，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对日本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我们才更有必要向自己提问：我们日本人，为未来在两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不确定事态”，究竟做了多少准备？

（加藤嘉一，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04/3）

【返回目录】

11-3 刘柠：假如中国失去日本



“■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难以运行。

■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

■失去日本，就失去了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日本有部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日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日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幻想。而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那也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是，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

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日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譬如，对上世纪 30 年代初到 40 年代中的中国来说，“失去日本”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日本的头上。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日本惹的祸。

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把对象（日本）放在当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弱化了？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首先从经济上加以比较，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 GDP 为 4.4 万亿（美元），中国为 3.4 万亿，差距还有 1 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 3000 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 2011 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2007 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构成及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4 年前，日《呼声》（《Voice》）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日本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3.1%，美国占 2.7%，而中国不到 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 3000 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 3500 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 5 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 GDP 的构成，就知道长谷川庆太郎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 GDP 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些难为情。

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 GDP 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日本经济高增长期的 1960 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 9 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节能等问题，而这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功课，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制造部门转移到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几乎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许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甚至连总部大厦都卖掉，按不同的事业部租写字楼办公，实现了“小而精”的转型。所谓“以小制大”，决非戏言。预言日本经济在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之后其存在会淡化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失去日本”更是无法想象的。

酷日本：中国的文化参照

再看文化。说是文化，其实跟经济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众所周知，日人爱讲“立国”：“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环境立国”、“观光立国”等等，不一而足。每次“立国”口号的调整，都意味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府便基于日本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成为面向 21 世纪的“民生大国”（CivilianPower）的国家战略，为此而打出了“教育、文化立国”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并非是茶道、花道、大相扑等东洋传统“国技”的孤立存在或泛泛而谈，而是以这些文化符号为核心，加上现代元素，以高度商业化的手段重新包装，旨在打造所谓“酷日本”（CoolJapan）的国家软实力。这方面，最典型者是动漫，如今已成日本创意文化产业的支柱。其在 GDP 蛋糕中的构成，丝毫不逊于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金融的份额。

也许是由于日人性格中有“匠人”情结，也许是其文化本身的构造使然，日本的“纯艺术”（FineArt）似乎较容易与工艺、技术结合，超越传统的“日本美”，成为浑然天成的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同时也是孕育产业的酵母，其建筑、摄影、时装等无不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并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这些背后有强有力产业化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日本在赚取大把外汇的同时，借用一句时兴的表述，也在“输出价值观”，改写着昔日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失去这样的日本的话，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吗？至少会少一些趣味、精致和异国情调的梦幻，也许还会失去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假如没有日本

诚然，对中国来说，现状的日本是一个难以尽如人意的存在，正如反过来一样，现状的中国，也离日本的期许（或想象）相去甚远。但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甚至民间段子的二手“内存”已堪称“丰富”，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国家战略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呢？原因不在“异邦”，而在于我们的“想象”，所谓“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只有接受现状的存在之一途。尝试改变，要在原则接受的前提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改变也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

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轻减、缓解。但问题是，近年来以“日本”为对象的情绪性表达，其真正目标完全是日本吗？有没有拿日本说事，发泄某种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际、不遇的成分？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如果连日本的“消失”都无法减轻国人的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是不是一定源自日本便存疑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惟其东邻有日本的存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才不致完全落空。虽然有误读的成分，有基于误读的情绪性发泄，但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频密，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刘柠，作家，著有《“下流”的日本》。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03/0）

【返回目录】

【状】

11-4 李长声：日本的形与型



“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人讲究形式，简直讲究得做作而令人厌烦。作为传统表演艺术的术语，‘型’就是我们京剧中所谓程式。他们追求中规中矩，往往也流于形式。哈腰撅腚地行礼，我们看不惯，说得好听点，是他们礼多，说得难听就是虚。”

富士山是日本最高峰，但与其说日本人赞赏它的高，不如说更喜爱它的“形”，从哪里看它都是个近乎完整的圆锥形。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姿，描绘它颇难，画家在色彩上别出心裁，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便画出一座红山峰。独具形状的富士山无须借景，从温泉旅馆的窗口远眺就足以相看两不厌。日本人攀登它，并非爬上去“然后小陵丘”(曹植诗)，而是为一种土俗信仰。诸侯割据的年代，织田信长要统一天下，筑安土城，修五层七重的“天守阁”(城门楼)，才有点登高望远的意思。欣赏日本式风景，需要坐下来平视，这种审美意识来自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含了些禅意。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大小十五块石头，怎么看也不能一览无遗，若登高俯视则尽收眼底，人就会有气吞万里如虎的胸怀也说不定。

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人讲究形式，简直讲究得做作而令人厌烦。作为传统表演艺术的术语，“型”就是我们京剧中所谓程式。他们追求中规中矩，往往也流于形式。哈腰撅腚地行礼，我们看不惯，说得好听点，是他们礼多，说得难听就是虚。我一向很怵头茶道、香道的“作法”，跪坐在榻榻米上，挺直了腰板，真想瘫倒如泥，虽然中国有一句老话，站如松、坐如钟什么的。能剧的过程、插花的结果、剑道的招式、敬语的说法及国民的品性，都具有形或型，成形而定型。“形”或“型”是日本文化的关键词，保护这些也就保护着传统。

日本的形或型，好些都非常美。譬如庭园“枯山水”，只是用沙和石，布置有致，像公案一样令人费寻思。菜肴、糕点，形与色都美得令人不忍下口，大有买椟还珠之惑。包一个包袱，我们只要把零散的东西大一统就行了，而日本包裹也包得有形，充当装束的一部分，袅娜走路。常说日本人热爱自然，其实他们更喜好加过工的自然，看人家院子里的树木，修剪成千姿百态。不过，从有形到无形，从万变到不变，日本美的真髓是难以捉摸的幽玄。

司马辽太郎卒于 1996 年。他以历史小说闻名于世，但晚年不再写小说，专心写随笔。自 1986 年在《文艺春秋》杂志上连载，结集为《这个国的形》，死后印行第六册。建筑、室内装饰或家具，日本人所好被译成别的形，从而具有普遍性，这种事，司马认为一般的民族都会给世界的造型思想以影响，他不去琢磨。他深思的是关系到人或国的发展过程的思想及日本原形(原型？)，他眼下的这个国家怎样被造成。他说：日本人总是从外面拿来思想，但思想大都只是取书本之形。譬如儒教，在日本不过是一种学问，也就是书本，从未形成能驯养民众的普遍思想。如果把儒教整个都拿了来，日本早就变成中国社会了。

文学家三岛由纪夫也说过：所谓保护文化就是保护传统精神。文化可以从眼睛看得见的、成形的结果来判断。文化可以是有形的。所谓形也是行动。看敢死队的行动我们认为很漂亮。日本人的各种行动，日本人的看法和西洋人的评价颇为不同。他们看来多么蠢，而我们觉得漂亮、觉得美的，有很多。三岛说这话是 1968 年，那时我是一青年，正要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三十多年后的 2005 年，我在日本，有一个叫藤原正彦的，出了一本《国家的品格》，大畅其销。此人的话多是拾人牙慧，七拼八凑在讲坛上倒卖：形和教育所培养的情绪赋予日本人以特征，而战后日本人被教育得丧失对祖国的骄傲与自信，腰腿完全软弱了，轻易忘掉了自古以来傲然于世界的情绪与形，卖身给市场经济所代表的欧美思想。所谓形，主要是来自武士道精神的行动基准，所以他鼓与呼复活武士道精神。

日语的“型”字引申有传统、习惯、特质、规范、模式的意思，但是借假名之便，他们用汉字不像我们严得以至事关国家的品格，形和型常混为一谈。在文字上，日本很有点不定型，乃至不定性，闹得我也搞不清该用哪个了。

（李长声，旅日作家。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29396）

【返回目录】

11-5 矢野浩二：日本人眼里的中国



“中国人在对人表达意愿的时候，不管对方听不听取会先说谢谢。欧美国家可能也有相类似的表达，举例说，他们会通过‘Thank you for waiting’来表达‘让您久等’的意思。如果先说谢谢的话，对方就能意会到这默认的不得不接受的意思。虽说看起来有点强求的意思，但是这种中国式的方法能让人觉得很爽快。我觉得因为是要向人表达意愿，当然率直的说声谢谢是很好的。”

我在中国居住了将近11年，偶尔回日本的时候会不禁注意到日本人的规范的礼仪、服务以及真诚的待客之道。

日本人约定成俗的口头禅似的经常性说着“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在日工作或者留学的中国人不就是觉得这就是最难融入日本社会的一部分吗？日本人的“对不起”不止是对不起那么简单，有时候会是谢谢，以此表达谢意。但是一般的中国人看来，频繁的使用“すいません”，反而给人一种"太客气"、“太见外”、“有距离”之类的感受。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也经常连道“对不起、对不起”的鞠躬行礼，的确可能是最近不再弯腰鞠躬了，也不是有意为之，可能是程度稍轻点的吧。

有天晚上去附近的商店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公寓门口的警卫像往常一样给我开了门。我最后示意的说了句“谢谢”。于是，警卫突然挡住我的去处，诘问道：“你，上几楼？”。这个急转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相对于为我开门的警卫人员，如果我什么都没说不就是什么都没做吗？但是，因为对于熟悉的住户的话谢谢本不用说，所以警卫人员便知道我是外人。之后他戴着帽子对我点头让我通行了。

从日本人的想法看来这点令人难以理解。这种不必说谢谢都可以维持的人际关系，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连说都不用说。当然必要的时候还是有说的。

比如，在飞机上就餐的时候，如果前座的人座椅往后放，吃饭就特挤得慌，就希望前座的人能稍微往前放点。这个时候，日本人恐怕会说："对不起，能帮忙把椅子往前放点吗？"。希望对方听取自己的愿望，这种情境下说"对不起"是可以理解的，日式的低姿态总不可能做错事。但是中国人会这样：他们会说："请您把桌椅往前，谢谢。"，也就是"以希望对方听取的愿望作为前提＋以此相对的感谢"。

中国人在对人表达意愿的时候，不管对方听不听取会先说谢谢。欧美国家可能也有相类似的表达，举例说，他们会通过"Thank you for waiting"来表达"让您久等"的意思。如果先说谢谢的话，对方就能意会到这默认的不得不接受的意思。虽说看起来有点强求的意思，但是这种中国式的方法能让人觉得很爽快。我觉得因为是要向人表达意愿，当然率直的说声谢谢是很好的。

我在日本长期生活所掌握并经常条件反射的笑着说的“对不起”，现在也基本上多数情况下会用“谢谢”来代替使用，我的“谢谢”中也多数含有“对不起”的意思。

（矢野浩二，调酒师、演员司机兼随员、电视剧临时演员。本文选自译言网，译者 nome。
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09524/306289）

【返回目录】

【知】

11-6 资中筠：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

“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 30 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宋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 1917 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

做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卢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

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做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国人在一切领域的通病，非独日本研究为然。只注意政治、经济，只有“有事”时才引起注意，于是大家一窝蜂关注某一个问题。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的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很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耐心去钻研。日本尽管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常被提到，但注意力也只在其经济，甚至把它的繁荣纳入“儒

家”文化的成就，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论者作依据。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也受冲击，亚洲|价值之说才式微。

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对西方文化，作为完全的他者，还可以认真研究，或承认其优越处，乃至“拿来”。而对日本，则总是于心不甘，看不到它早已“变异”成为另一品种，而念念不忘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其实也不否认与中国的文化传承。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随团访问日本，参观位于四国的一家造纸厂。首先被引进一间关于日本造纸历史的展览室，图文、实物并茂，从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开始，详细展示造纸术在中国的进步过程和达到的精致程度，其中有极为精美的宣纸。再说明每一种工艺何时、如何传入日本，然后日本如何在这基础上逐步改进，出现一代一代的新品种，后期就包括向欧洲引进的技术。以后各陈列室是日本自制的各种新品种，按顺序一间间走过去，直到最后眼前一亮，到了一间高大的厅堂，从天花板到地板如幔帐般泻下无数耀眼的白条，像布又像绸，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主人介绍说这是一种最新的特种纸，比任何金属轻薄而坚韧过之，可用于宇航工业。现在又已过去 20 年，不知又研制出了什么新品种。这就是日本，它从不讳言早期中国的影响，同样也不讳言中期向西方学习。重要的是自己现在创造的成绩。提起日本人的特点，好像不以心胸宽阔见长，但是至少这种不耻向任何人学习的心态，难道对我“泱泱大国”没有启发？

台湾一位农业博士来大陆某地考察，发现当地农业局完全没有本地气象、土壤以及病虫害等资料，局长也对此一无所知，却热衷于与“招商办”的官员一起以陪客吃喝来“招商引资”。据那位博士称，他家乡的地方政府都出钱买世界上最好的设备进行化验分析，然后免费将资料提供给农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但如此，近年来大批台湾农业博士到大陆考察，都带上各地的土拿回台湾化验分析，现在已有了中国大陆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料！台湾人是我国同胞，那么在务实和钻研精神上的这种反差，恐怕不能以“国民性”和“文化差异”来解释了。难道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 2007 年第 5 期《随笔》，转载于爱思想网。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740.html）

【返回目录】

11-7 赵楚：假如甲午战争重新来过



“100 多年来，因为惨痛的近代史，中国人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始终不能摆脱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思维，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倘若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

在当代中国，日本二字犹如超级 G 点，各种形式夸张地渲染历史仇恨的东西多如牛毛，但很少有人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近代以来，日本除了伤害中国，从留学东洋到辛亥到改革开放，日本也是于中国大有恩惠、确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一味的仇恨历史观会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不值得思考和反思吗？

甲午过去 100 多年了，中国人大部分还是没明白，假如回到 1894，那么我们应该直面的问题是：在那场战争背后中日的核心竞争是什么？从甲午到中国抗战胜利，战场上的胜负都是暂时的，但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文明、制度和社会发展竞争才是核心的，因为这是国运与民族命运的竞争，也是最实质性的国际权力之争，今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这场竞争再次复燃，但中国还是远远落在后面。

大多数中国人除了爱漫无边际抒发莫名其妙的豪情，也爱奢谈历史，可自甲午至辛丑间的历史文档俱在，资料唾手可得，我们不妨去读读，相比那些惨痛失败后当时人的反省之沉痛，措置之坚定，谋划之艰难，我们今日如此草率议论国家长策，是不是愧对先人？

说起甲午，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军事迷拿北洋海军说事，而不看当时淮军和国内社会总体状况。中日当年的差距决不仅是什么主力舰火炮射速、军舰航速等等，而是总体性的、制度性

的和全面的。淮军军制完全处于旧制，而日本已完成包括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现代陆军建设，即令相对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北洋海军，其实也处于太多传统弊政与弊端的掣肘之下，维护军力之不济，原因在于政治，而由于军令、军政不修，观念、决心不明，遂发生驱逐琅威理事件，使战力建设江河日下。一句话，当时的战争，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已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与一个尚未转型的老大帝国之间的，因此结局不难预知。很可叹今日中日整个社会和文明发展水准差距也未见得比甲午缩小多少。坐井观天，忽悠自己唯一结果只能是灭顶之灾。

甲午战前，办洋务的，经手实际事务的，几乎个个保持谨慎立场，只有所谓“爱国”清流，主战高调唱到云端，这些人主要推动下，颟顸的最高层做出了错误的战争决策，然后才谈得上战场上的失败与责任，正是这些文辞抄自烂漫古书的清流以满腔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豪情乱来葬送了国家自强的前程。在这种武臣与文臣、疆臣与朝臣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折射的是国家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没有整合，因此没有合理和有效的战略决策体制，因为那种优良的体制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甚至压制政治转型的社会萌生与扎根的。

19 世纪侵台事件后有大办海军的战略讨论，甲午战败，遂有建设新式陆军的举措，这些史实最起码表明，100 多年前的前辈在内外交困的处境，尚能为保国保民做长远切实的谋划，今日内外环境如此复杂，何曾见士大夫或食肉者能体味当年苦涩反思的情怀？中国人自己拿人命和国运换来的教训已被丢至脑后！

百年以来日本给中国造成难以衡量的伤害，这要由日本负责，但同时，中国人屡丧先机，不能反省，好了伤疤忘记疼，坐失国家民族大好发展机遇，这要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负责。日本虽有历史罪恶，但其在近代以来的东亚乃至全球文明竞争中成就斐然，这值得中国人再三再四低首拜服并学习，无此态度，则中国也许永无超越日本之一日。

自甲午到侵华，日本对中国几十年功夫，从山川草木到民情地理，几乎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而今日中国旅日人民据说高达百万，但一般“爱国家”说起日本，还是“小鬼子”、本尼迪克特那点陈词滥调，与激烈仇视态度并举的是极度无知。与日本所谓“右翼分子”对中国的无知一样，中国大众很多人对战后日本以及当代日本社会、经济与一般情况的了解，也是惊人

无知的，而某些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商业招徕的媒体又推波助澜。试问：以这种现状挑起中日对决，结局可能比 1894 年好吗？

历史非常辛辣，回顾抗战前，抗日救国是倚天剑屠龙刀一类道义大杀器，但事实表明，很多当初高喊抗日口号的，在战时丝毫不犹豫与日寇妥协和合作，原来他们喊抗日，喊爱国，只是操纵公众、谋求私利的工具，对于他们，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梅思平之类大汉奸今日已臭名昭著，即令汪精卫本人，在九一八和热河事变后，何尝不是以高调惊悚世人？再看今日试图操纵网络舆论的各种“爱国家”，明眼人都知道，有人正在重操故伎。

100 多年来，因为惨痛的近代史，中国人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始终不能摆脱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思维，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倘若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因为，世界变了，帝国主义的外交理念已经为这个时代所抛弃，中国的未来全球地位不可能基于船坚炮利和霸权主义，而只能在于对全球生活正面价值观的贡献及参与。世界将乐于见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中国将选择和平的、建设性的、分享的政策，与其他人一道，帮助世界建立一个更公平和有利于共存共赢的未来。

从南海到东海，中国在战略上隐然有四面出击之势，有人以所谓鹰派自居，对这种全面开花的对外战略大力欢呼，然而，这种有强烈新冷战思维的政策理念，既非中国国力所能承担，也与当代世界潮流相违背，同时，在近年兴起的新民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社会上新极左势力上下其手，借机追求操纵大众意识，如此下去，不要说什么战略机遇期，可以预言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新甲午。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站起来阻击这种逆流。

（赵楚，军事专家，专栏作家。

原文链接：http://zhaochuboke.blog.163.com/blog/static/207319147201281311474930/）

【返回目录】

11-8 杨潇、黄广明：中国文化可以治疗“中国恐惧症”

“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是选拔优秀的孩子对他们进行教育，这听起来不错，但还是有很多缺陷。什么叫优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日本人的想法是，不管你的素质如何，教育都是必须的，这种想法是根深蒂固的。”



早稻田大学掩映在山手线内一片民宅之中，早大名誉教授依田熹家的工作室也隐藏在地铁站边一个狭窄的单元里。虽已退休多年，但这位 70 岁的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仍常来这里工作。工作室不大，到处堆满了与中国有关的书籍。

依田先生的专业是近现代思想史以及中日比较研究，在《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一书中，他从 4 个方面比较了中日两国在文化、社会形态上的不同——譬如，在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属“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在社会教育形态上，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日本则是“普及-提高能力型”——由此，导致了对各自现代化进程截然不同的影响。

中日教育差别

人物周刊：您曾进行过中日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经常看到有人说中国现在处于日本的哪个阶段，您怎么看？

依田熹家：这个是比较难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在一方面接近于日本七八十年代高速增长期临近结束的时候，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又很难简单地比较。

人物周刊：在东京坐地铁，感觉日本人读书的很多，日本人爱读书的习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依田熹家：应该是在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据史料记载，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来的外国人就在日本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日本人包括商店店员、婴儿照看者，甚至马夫都在看书，他们看的是售价便宜的小说。这就很有意思，当时一般的老百姓已经能以文字来获取娱乐。在江户时期，英国来的公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虽然我不觉得日本比英国发达，但在初等教育方面，日本比英国要领先很多。英国当时应该是世界现代化最发达的国家，如果他也这么说，那么应该有可信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一时期？

依田熹家：我专门对这一问题做过调查。在江户末期，老百姓接受教育已经很普遍，读书的风气已形成。明治以后，西方教育制度开始引入，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家读书。我们看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以为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度就能促进教育的发展，但实际上未必如此。日本的情况在于，民间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教育风气，在此基础上再引入西方教育制度，便相得益彰。

而回头说江户时代，当时统治阶级是武士阶层，对于武士，是积极鼓励他们学习的，对庶民倒没有相应的措施，因此与其说读书风气是由上及下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然形成的社会风气。

1900 年左右，中国正在发生义和团事件，这时候，亚洲各国的文盲率非常高，而在日本，包括农村在内的男女儿童 4 年制小学入学率达到了 90%以上，只要你进了小学，基本上都识

字。（拿出自己的著作《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国更多是选拔达到目的型教育，而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教育。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日本的教育是大众教育，中国则是精英教育，可以这样理解吗？

依田熹家：是的。1930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也是如此，出现了所谓"欠食儿童"。当时小孩子上学读书还需要自己带便当，但经济不行，就吃不上了。这应该是很悲惨的情况，但也可以显示日本教育制度的一个特点：即使没有饭吃，还是有书读。（笑）一般情况是，你连饭都没得吃，那就留在家里帮父母干活好了嘛。所以说日本教育是能力普及型的，如果你不去读书，人们会有普遍的担心，觉得你在常识、在能力上会跟不上，所以家长都会坚持让孩子去读书。

文革之后我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当时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显示出比城市更多的活力，出现了很多万元户，可是农村的入学率反而降低了，我当时听到很多这样的话：不读书也能挣大钱啊。因为中国的教育文化是选拔达到目的型，他有钱了，达到目的了，自然不想要去读书了。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的，你如果不去，别人能力提高了，你的能力落下来，会有危机感。

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是选拔优秀的孩子对他们进行教育，这听起来不错，但还是有很多缺陷。什么叫优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日本人的想法是，不管你的素质如何，教育都是必须的，这种想法是根深蒂固的。

人物周刊：孔子倒也说过 "有教无类"。

依田熹家：孔子说有教无类，但后来科举制度造成了精英的教育，有了科举，学问就沦为了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手段。我认为中国科举制度的确起了很大作用，昔日巨大的中华帝国实际上是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大批人才支撑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弊端，它太过强烈的权威性阻碍了教育的普及，也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最后，人们理解的所

谓的学问，仅仅是科举中出现的东西。从西方传进来的大量学问，因为在科举中不出现，人们也不会把它们当作学问。

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所以也没有要选拔一部分优秀人才进行重点教育的传统思想。后来荷兰的学问传来时，日本人也乐于接受。当然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极大普及化了，但如果想更进步，有一点必须做到：把中国选拔优秀人才的核心思想，慢慢切换到普及和提高能力这一角度去。

中国要恢复文化大国地位

人物周刊：刚刚谈了科举的遗害，而说到现代的教育，您的观察是什么？您是否知道中国有所谓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重点班和普通班？

依田熹家：如果日本也有重点学校和重点班，我小时候可能就进不了重点学校。（笑）日本也有有名的学校，很难进，门槛高，但如果说从制度上把这些学校分出重点非重点，那日本是没有的，不论是中学小学都没有。人和一般的生产工具是不一样的，商品的话，有一些问题你顶多不用，可以报废的，但人不能因为有一些问题就不让他受到教育。

我认为当代中国最大的课题是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不是说不要在其他方面成为大国，而是我认为中国要被世界承认为大国，文化方面最为重要。我反对先搞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可以滞后这一观点，因为这样的观点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日本在二战战败末期，由于轰炸失去了大部分的产业，陷入极其悲惨的状况，这个时期最先提出的课题是文化国家的建设，这大量反映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当时日本国民由过去军国主义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在建设文化大国中找到了新的方向，而并非以经济大国为目标，结果日本成了世界性经济大国。

说起来日本是以文化国家为目标，结果成了经济大国，我认为里面存在着历史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也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原因在于江户时期的日本是世界上包括农村在内的平民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以此作为基础，明治维新后的义务教育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后制定的初级中学义务教育制。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如果仅仅是经济发展，不会得到世界的赞扬，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要是成不了文化大国，才是奇怪的事情。拥有广阔领土和庞大人口的中国，往往被周边国家所戒惧，但是只要中国采取了文化大国的姿态，周边国家的戒惧就会得到缓解。

人物周刊：要建立文化大国，中国有哪些价值观，在全世界可能是有影响力的？

依田熹家：中国传统思想本来是非常多元的，但从特定时期开始就以儒家为主了。诸子百家的东西都是中国本土的，我们应该再检阅一遍，看看里面有哪些可以发光的东西。这是中国巨大的财富，还有待进一步认识。

人物周刊：日本文化是怎么完成现代化转换的？

依田熹家：我研究传统文化多一点，我一直觉得传统文化里有大智慧，但也有必要引入西方的思想。以前有一段时间，“文化侵略”这个词在中国听得比较多，这对日本来说是最最难懂的词语了，因为日本的近代史就是吸收的过程，所以没有这种感觉。如果吸收外国文化就等于受侵略，那日本等于是一直被侵略到现在的。（笑）

现代化，仅仅引入机器是不行的

人物周刊：以日本为例，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过程中，传统思想是怎么其作用的？

依田熹家：现代化的产业革命是发源于西欧社会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会从西欧吸取很多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各国的传统元素与西欧的现代化因素进行组合，这是个

问题。说到日本的现代化，很多中国人的印象无非是明治维新，但实际上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打了一个基础，最大的一个基础作用就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这对之后的现代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之后日本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接着有了自己的宪法、国会，是一步步过来的。

日本真正走向现代化是在自由民权运动之后。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的宪法和国会在很多地方不完善，但却是很重要的一步。后来，成年男子开始有了选举权，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同时，在日本议会，多数党可以成立自己的内阁，从那时开始养成民主政治的习惯。到 1931 年为止，日本国内政治制度基本成型了。

这之后日本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这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那 15 年日本的政治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表面上还是维持了原来的制度，但军部已经控制了国家的走向。1945 年，日本战败，在美军的占领下，日本开始战后改革。战后改革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和 1931 年前现代制度已经比较成熟很有关系。美国总统布什曾拿占领伊拉克和当年占领日本相比，认为在伊拉克也会很顺利，但他忽略了日本具备伊拉克所没有的基础。

人物周刊：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中日差不多同时起步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有洋务运动，日本有明治维新，但到甲午战争两国分出高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依田熹家：我赞同说中日现代化出发于同一起点。在生产力上，两国的差别不是那么大。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区别，那么在 1860 年代，日本的平民教育更发达，另外，日本有了上百年洋学的基础，并且已经把这些当作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有所谓文明开化运动，差不多和洋务运动同时期展开，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共同点是两者都从欧美引进了很多机械枪炮等硬件，而日本除此之外，还把西方的哲学、文学等软件也引进来了。日本是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成套引入的。

还有一个区别在于，日本在搞文明开化的同时，后来还进行了自由民权运动，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这样。中国洋务运动很蓬勃，但并未因此产生近代的议会。甚至产业

政策也有比较大的区别，开始时比较类似，但是后来还是大相径庭了。洋务运动是官营或者官督商办，而日本则是殖产企业，刚起步时形态与中国半官半商的企业类似，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它的性质慢慢起了变化。近代宪法和国会制度建立起来后，当时的产业仍是官办，民间受到压抑，后来民间向政府施加压力，官办企业转卖到民间，形成了以民间产业为主的近代产业，与中国的发展路径便不同了。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黄广明，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原文链接：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628.html）

【返回目录】

【论】

11-9 袁伟时：从后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看冲突与融合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 世纪 70 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80 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 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



以 1991 年 12 月苏联瓦解为标志，冷战时期划上句号。十多年来，中日关系风浪迭起，个中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日前与友人闲聊，问难辩驳，放言无忌。录之如次，聊博读者一粲。

矛盾客观存在，冲突还是融合却取决于双方决策

友：最容易激发中国人民族情绪的当属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令人捉摸不定。福田上台，胡锦涛五月访日，满天乌云又好像消散了。日本政客和右翼文人是麻烦制造者，他们一再挑动事端，讨厌极了。

袁：上一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一再剑拔弩张。我也不喜欢那些信口开河的政客和文人。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中日矛盾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其实，不少矛盾是复杂的，能有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经济上互以对方为最大市场之一，日本又是中国主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地之一。有好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但一直和平共处。

双方领土、领海争端——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终归缓和了。

吵得最厉害的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强迫劳工的赔偿、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对侵略罪行的认识等等。

最深的疑惧则是日本会不会介入台海冲突，会不会支持台独？

其他问题还有：如何对待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如何看待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政治同盟？

处理这些问题，成败互见，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友：两国关系总的说来是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或压制中国。

袁：从 1874 年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开始，140 多年的恩恩怨怨，至 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野心逐步膨胀，冀图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属国、殖民地，是中日矛盾尖锐的主要根源。不过，1945 年特别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简单地说，双方的决策对矛盾的尖锐或缓和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 世纪 70 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

80 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 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今年中日关系有很大改善，其中奥妙之一是历史问题点到为止，归于淡化。

如实认识现状是正确解决或缓和矛盾的前提

友：这样淡化，是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不清算历史罪行，以史为鉴，日本人还会玩花样。他们老想包围或孤立中国，一再冀图与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就是其中之一。

袁：日本的一些政客，观念还停留在冷战年代。他们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重要情况：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是帮助还是阻挡中国融入世界，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们不时玩弄一些小动作是冷战思维尚未祛除干净的表现。

不过，总结历史经验，处理认识领域的矛盾，我认为有三点是应该遵守的。

第一．尊重和等待。

认识总是多元的，即使你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至于你或他们的观点会不会改变，只能耐心等待。

第二．现实利益高于认识的分歧。

纠缠于认识分歧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陷阱，要寻求绕开认识分歧寻求双方利益的交汇点。

历史问题是认识问题，再吵三十年，也不一定能吵出双方满意的结果。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后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八年的何方先生说得好：“要逐渐淡化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更不可把历史问题定为两国关系的基础，而应当是邓小平说的‘考

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如果以历史问题为基础，那我们几乎会同所有邻国和主要西方国家都无法搞好关系。例如俄国占了我们 150 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列宁、斯大林都一直不承认；同其他邻国如朝、越、印度等也都有无法达成共识的历史问题；而当年一再侵略中国的列强又有哪个承认侵略呢？难道和所有这些国家都要算历史帐？"[1]他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一再提出这个观点，可谓远见卓识。把历史问题还给历史，让历史学家们从容切磋、论难；政客和平民百姓则各自慢慢思量，有何不可？

淡化历史问题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求同存异的正确选择。

第三．冷静、全面地认识世界现状是清醒地处理内外矛盾的基础。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十年间，我国一切错误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对世界现状缺乏清醒的认识。

1957 年以后，变本加厉在国内外大搞阶级斗争，弄得国内哀鸿遍野，国外到处烽烟。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法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相继驶进快车道，我们则仍在"革命"迷宫中打转，被远远抛到后面去了！

20 世纪下半叶有冷战，但在眼花缭乱的现象后面，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哪一国家和地区掌握住这个主旋律，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相应地扩大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自由，健全法治，实现民主，对外开放，就能走上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如果被局部现象迷惑，整天算计如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轻则内外矛盾交迫，发展迟滞；重则国家瓦解、灭亡，苏联就是典型。

友：难道与日本关系紧张，也是我们认识错误造成的？

袁：日本方面当然有处理不当之处。责任是双方面的。我们反省自己的。

---

[1] 《何方自述》（十三）电子版。

中国人最担心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不承认侵略罪行。人多嘴杂，社会现象繁复，这些指摘当然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例证。可是，片面和无知是近邻；全面了解有关事实，许多人的情绪也许会平和一点，不再采取不恰当的措施激化矛盾。

1. 1972 年到场 2001 年，从天皇到内阁总理，日本 21 次承认侵略中国和道歉。[2]以后的态度也没有变。

2. 日本制度变革的深远影响。被强迫民主化后的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杜绝了军人和元老干政的渠道，要复活军国主义谈何容易！

3. 日本的军费占 GDP 的比重一直很低，集中资金发展教育和经济，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他们得到的和平红利与导致整个国家毁灭的战争后果对比如此强烈，要煽动年轻一代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已经不可能了。

4. 日本民众和社会精英反省侵略罪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停息，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总的趋势是清醒的声音越来越强。

最初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人数不多，至 20 世纪 70 年代，承认和揭露侵略罪行的活动逐步拓展到主流学者和报刊。

《产经新闻》是日本影响最大报刊之一，以保守著称，乃至被目为“右翼”。1974 年 8 月 15 日它开始连载《蒋介石秘录》，历时一年多才登完。这部十五卷的书，是他们派出社论委员古屋奎二等人收集、阅读大量资料包括四千多万字当时没有公开的档案后写成的。其基调之一是谴责日本侵略。看看他们怎样叙述卢沟桥事变吧：

---

[2] “从 1992 年 9 月 29 日的《中日联合声明》，到 2001 年 10 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日本历任首相和天皇，已就过去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伤害和巨大痛苦，表示了 21 次的‘谢罪’。”（胡平：《关于日本的误读》，《粤海风》2008 年第 3 期第 21 页，广州）

“日军的目的是向中国挑衅，所谓‘一名士兵失踪’，根本是捏造，以作为武力攻击的藉口。”“实则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则是因解手而离队，20 分钟之后便已经回到队上，但日军却隐瞒这个事实，坚持非进入宛平城不可，以造成开火的藉口。”[3]

指着鼻子骂日军发动侵略战争，态度何等鲜明！

再以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南京大屠杀来说，它是这样记载的：

“日军首先将未及撤退的中国军人解除武装以后，使列队于长江岸边，用机关枪扫射，系数杀戮。

继之，残杀的对象更及于妇孺老弱。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所属‘妇女收容所’收容了 7000 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载运出去，加以强暴以后，再行杀害。”

“像这样地不管战斗员、非战斗员和不问老幼男女的大屠杀，达 2 个月之久，有说是屠杀了 30 万，有说 40 万，直到今天都还未能明了其确实数字。”

“据东京军事法庭判决，在南京屠杀的军民合计至少 20 万人以上，被掠夺、放火的民居约为全市的三分之一。”[4]

进入 21 世纪以后，否认侵略罪行的右翼明显居于劣势。标志性事件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社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在 2006 年出版。正如该社总裁兼总主笔、81 岁的渡边恒雄所说，如今，除了个别报刊外，“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责任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已形成重要共识。”谴责那场战争的“侵略性、残忍性”，批判靖国神社游就馆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谬误，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5]

---

[3] 《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四卷第 2 页。

[4] 同上，第 38~39 页。

[5]新华网东京 2007 年 8 月 1 日电(记者江冶　吴谷丰)。

作为多元社会，日本国内有各种各样为侵略辩护的奇谈怪论；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仍是日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彻底解决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但是，总的趋势是反省历史罪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逆转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是突出历史问题，还是专注关乎中国发展和国家现实利益？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友：那时他们正处心积虑消灭中国，想对外开放也不行。

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大使馆不想离开中国，通过多个渠道表达美国政府力图与新政府建立联系的意愿。

二是张治中等民主人士直截了当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对外不要一边倒。毛泽东公开拒绝了这个明智的建议。

对历史的片面认知是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

友：恕我直言，你这些观点正是饱受指责的汉奸言论。什么“对日新思维”等等，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

袁：“汉奸”是不严谨的概念，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当然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汪精卫一伙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为了金钱出卖军事情报等机密的无耻之徒，他们是不是所谓“汉奸”、“卖国贼”则要烦劳法律专家认真研究了。我说的国家机密是指真正的事关国家利益的机密，而不是别有用心随意编造的所谓机密。

现在时兴的骂别人为汉奸的那些狂热分子，大都是无知而偏激之徒。随意在政治层面诋毁他人，激化矛盾，说轻一点是无知。如果是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将来见识增长了，会内疚和脸红的。

即使是历史人物，不少被目为卖国贼的，其实也是无知加偏激制造出来的。

友：你想为他们翻案吗？

袁：不是翻案，而是要排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干扰，还原历史真相。看看“汉奸”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非常有趣。

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被守旧大臣和无知文人咒骂为“汉奸”，原因无非是他在 19 世纪 70 年代敢于直言中国不但在器物层面落后了，而且在整个文明发展水平包括价值层面都落后了，已沦为“无道”之国！他不过是为了救治自己的国家说了大实话，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救国先驱！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大批文人说他出任对外公使就是“事鬼”，应该连他的祖屋都烧掉！

远的不多说，讨论一下民国时期的情况吧。

友：难道说曹、张、陆一伙是卖国贼也错了？

袁：正是如此。

1919 年五月四日的爱国大游行，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贼指的是：曹汝霖（1877~1966）、章宗祥（1879~1962）和陆宗舆（1876~1941）三人。壮烈的一幕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其实，曹、章、陆的“国贼”帽子都戴得有些冤枉。要是说五四当天学生们烧别人的住宅是爱国情绪支配下违法的过激行动，时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笼统地指斥他们“卖国”，就有治学不严谨之嫌了。

他们为人诟病之处主要是参与对日外交中的表现。其中有四个标志性的事件：

1. 二十一条谈判。

曹汝霖（外交部次长）、陆宗舆（驻日公使）都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但在袁世凯支持下，他们和其他参与者一道，对侵犯中国主权最严重的第五号的七条要求[6]，坚决不予讨论；其他条款也想方设法减轻了中国的损失；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这样做不太容易。“汉奸”、“卖国”云云，显然根据不足。顺便说说，在上下一心抵制下，被迫答应的那些条款也大都没有执行。

2. 西原借款。

首先要肯定民国建立后，政府长期入不敷出，任何人当政都不能不借外债。借债不等于卖国。为什么借日本人的钱？王芸生有个精辟的分析：“自欧战以来，日本工商业大为发达……当时政府乃以对外投资为政策，计为外国发行债券几达六万万元，其中英国国债为二万八千万元，法国国债为七千六百万元，俄国国债为二万二千二百万元，其对于中国之投资，不过施行其同一政策，西原特为其政府推行而已。”[7]

1917 至 1918 年间，日本寺内内阁上台，一反前任大隈内阁的外交政策，对华比较友好，以民间名义，委托西原龟三为中介，先后提供七笔共计一亿四千五百万元贷款。与当时其他外国贷款不同，这些贷款不打折扣，十足支付，不收手续费，低利率，大部分没有切实的担保，没有附带政治条款，在民国初年的贷款中是最为优惠的。民初中国政府对外借款通常是合约上写借一百元，实际只能拿到 90 元左右甚至 85 元。在此以前，只有 1916 年由驻美公使顾维钧经手的一笔 500 万美元的贷款也是比较优惠的[8]。难怪 1918 年 9 月日本寺内内阁垮台，原敬继任内阁总理，就不愿意再提供这样的优惠贷款了。

---

[6] 第五号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之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此外，还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权，在全国有“布教”权和几条铁路的建造权等等。

[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37 页。

[8]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83 年北京版第 145－146 页。

再从用途看，与流传甚广而未经核实的宣传文字不同，实际情况是：“借款的五成多用于中国交通银行之整理及支付内外债之利息，三成多用于参战准备的军事费，其他一成多用于用于一般行政费用。”[9]“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的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10]

条件优惠而且大部分没有归还，白白给中国人用掉，日本政客在本国挨板子理所当然。中方有关人士被目为“汉奸”，那就有点冤枉了。何况这些贷款即使有问题，主要责任人也是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和段祺瑞，跑腿的曹、章、陆承受不起那么大的罪名。

3. 胶济铁路交涉。

1914 年 7 月 28 日，欧战爆发。8 月 23 日，日本对德宣战，同日与英舰共同攻击德国租借地青岛，占领胶州湾的军事行动开始。9 月 2 日日军万人在龙口等处登岸，奸淫抢掠，军纪很坏；此后节节进占，10 月 6 日侵占济南车站，胶济铁路全线落入魔掌。赤裸裸的侵略令人发指。

面对各国的压力和中国的抗议，几经交涉、折冲，双方达成协议。1918 年 9 月 24 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章宗祥旋即覆照后藤：“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11]日军撤退，民政权收回，减轻了侵略后果，乍看是好事。不过，这些权利本来应该从德国人手中直接收回，这样互换照会，等于承认日本有权继承德国侵占中国的权益，为日后交涉留下大患。这就是在巴黎和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中国政府“欣然同意”的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的由来。

---

[9]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史事部分（一）第 377 页，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7 年台北版。

[10]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 110 页，三联书店 2005 年北京版。

[11] 同上第 167、168 页。

这是卖国罪行，还是经验不足的失误？王芸生在九一八以后编纂的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说："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之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12]这个论断是公允的。

4. 抗日战争期间的言行。

认真研究过 20 世纪 30、40 年代抗日战争史的多数学者都会承认，这一时期，尽管华北傀儡政府和僞汪政权曾将 "咨询委员"、"顾问"之类的帽子加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头上，但他们都变着法子不到任，没有做损害国家利益的坏事。

从以上四件事看，大体上可以断定他们不是什么卖国贼。

友：成见与真实相差太远了。

袁：政治介入或利用学术，麻烦就出来了。

占领道德制高点，把自己装扮成爱国和革命的化身，而反对自己的则是汉奸、卖国贼，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现象。于是，一些专制统治者和政客惯用的伎俩是宣布自己不喜欢的人是外国反动势力的代理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异己分子，冀图挑起公愤而谋私。

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对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力倡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闭着眼睛说瞎话，诬蔑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可是，弄巧反拙，1938 年 3 月 15 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开信揭露这个谎言，说一些报刊"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

[12]同上第 167 页。

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13]

诬陷对手为“汉奸”，更是蒋介石的惯伎。翻开蒋介石日记，一个突出现象是“汉奸”、“卖国贼”、“反革命”的字眼连篇累牍。胡汉民、孙科、陈济棠、龙云、邹鲁、阎锡山……都曾被他加上这些歪帽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笔下的“共匪”）更不在话下，全是与日寇勾结随时准备投降的卖国胚子。盖棺论定，绝大部分都是此公信口雌黄、不值一驳的捏造。

友：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有不小的市场？

袁：这与中国文化的几个根本缺陷息息相关。

一是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国缺乏深厚的忏悔传统。个人修养还讲点“一日三省吾身”之类的话，就民族文化而言，总是认为已经达到极致，出现问题不过是执行圣贤教导不力所致。

19 世纪以降，中国成了一个一再被侵略者打败的国家，一个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国家。古方正药已经不足医治痼疾。除了谴责侵略者的凶狠，分析客观困难外，走出困境的基本方略是找出自己的弱点，学习一切人的长处，勇敢地改造固有制度，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障碍。

强者从来不害怕反省；讳疾忌医是弱者自我毁灭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国的悲惨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强迫症，不但自己不愿也不准别人反思本国的弱点。谁敢违反这个潜规则，谁就是大逆不道！

胡适的“买办文人”即准汉奸帽子就是这样戴上的。

二是不讲形式逻辑。

---

[13] 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1~266 页。

学术界多数人早有共识，从先秦起，形式逻辑没有生根和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这个弱点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既妨碍现代科学诞生，也妨碍社会转型。当下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继续在这个泥淖中打滚。一说 19 或 20 世纪的大清帝国或民国统治者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错误，就说你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是汉奸、卖国贼！把 A 和 B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糨糊；如此弱智，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远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国的狭隘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一些固陋之士挨打时痛骂敌人是蛮夷，大言不惭中华道德文章举世无双，不准“以夷变华”，把自己装扮成民族大义的化身，冀图一举跃上文化和道德的制高点。几经挫折，不得不学习洋人的本领，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速路，这类人的继承者则变个调子，胡吹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人永世无法企及的特殊基因，敢持异议者，肯定是崇洋媚外之徒！于是，无论顺境还是困逆，乱派“汉奸”帽子都是沽名钓誉的捷径。

四是以“革命行动”定是非，或曰“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以极端分子的激愤言论和口号为标杆，横扫一切。

五是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传统。

公民社会的成熟以自由讨论为首要条件。一个现代国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公民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非常正常，也是多数公民在多元比较、辩驳中逐步走向理性、成熟的基础。不过，中国的传统是思想统一，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圣贤和圣上的是非为是非，不准越雷池半步！依傍权势的棍子党应运而生，被压抑的沉默多数在浑浑噩噩中沉沦！

动辄斥责别人为“汉奸”、“卖国贼”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嗜好和有利可图的勾当。头一笔红利是显示自己爱国主义立场无比坚定，政治正确，道德高尚，比对手肯定高出一筹！

于是，谔谔之士视为敌对分子。知识群体犬儒化，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消磨殆尽，大批沦为清客、侍从、御用文人，创新锋芒消失，学术棱角磨平。

公正地说，那些肆意诬陷别人“卖国”，不惜制造和激化矛盾的家伙才真正是损害国家利益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人。

调和矛盾、融入世界是不发达国家的唯一出路

友：肆意激化矛盾当然不对；但是不管形式怎样，矛盾总是通过斗争解决的。

袁：斗争哲学在中国的遗毒很深。概念之争可以弄得很烦琐，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我们还是让哲学回归社会生活吧。在中国的语境中，“斗争”的内涵通常包含冲突。

我同意矛盾无所不在，但是解决或发展的过程没有命定的规律，人们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塑造出不同的过程和结果。就社会矛盾而言，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处理过程不断调和，避免决裂；结果是融合新旧，综合各方，力求完美。

要达到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容易。障碍在于过时的观念把中国人的手脚捆住了，必须冲破自我设置的牢笼，解放思想。

友：去年三月，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年多了，还在吵这个问题。

袁：积重难返啊。中国社会转型三十年了，走出了死胡同，值得庆幸。涌现了一批筚路蓝缕的英雄豪杰，但也弥漫着转型期特有的庸人综合症。主要病征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眼光狭隘，观点陈旧；但是一披上民族大义和为穷苦人说话的大衣，反对者似乎就有罪了。

友：你历数了不少陈旧观点，眼光狭隘有什么主要表现？

袁：在民族主义和民粹情绪支配下，以阶级斗争多疑症的偏光眼四处搜索，根本看不清世界发展的全局。

有些人把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历史记忆化为道不完的国家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他们忘记了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从累见不鲜的血亲复仇开始，群体或个人互相砍杀，归根到底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记住仇恨是为了化解仇恨。以协商、谈判、民主、法治代替杀戮为解决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的矛盾，寻求双赢，是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进程。西欧再次成为文明发展的领头羊，法德世仇化解就是让人景仰的典型。合理的联想是：中国和日本为什么不能化解矛盾，携手共进？

全球一体化无法抗拒，也是促进人类福祉的康庄大道。地区自由贸易区、地区共同体是全球化的过渡步骤。中国人应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促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乃至亚太共同体降生。热衷给别人乱戴汉奸、卖国贼帽子的人，对这些都是反对的，鼠目寸光，太可怜了！

友：还要不要讲国家利益？

袁：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化解国家之间首先是同周边国家的矛盾，促进联合，让各国都能集中精力发展和改革自己，就是最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

友：你太理想化了。全球化是大国支配全球，不发达国家吃大亏了。

袁：要看穿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分子反对全球化的陈词滥调。一百多年特别是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以 1978 年为界，闭关锁国与融入世界，不是冰火两重天吗？一些国家现在还在饥饿线上挣扎，与富裕国家差距拉大，不检查自己的方针政策，将落后和腐败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帝国主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疑在谋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同一个世界，不发达各国的状况却大不相同；说到底无非是坚持狭隘民族主义、斗争哲学还是主动调和矛盾、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的不同后果。激化矛盾，制造冲突，再过一百年也走不出困境。调和矛盾，按照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改造本国社会的运行机制，融入世界，是所有不发达国家提高人民福祉的唯一出路。

2001 年中国毅然参加 WTO，1997、1998 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总结和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既是制度选择，也是文化选择，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都体现在其中了。标准非常明确，问题是要落实。希望在前，但道路漫长，艰险，需要各方出力和监督。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7669）

【返回目录】

11-10 张少峰：中日之身份政治

“对中日关系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学者常以“囚徒困境”、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美国因素、能源竞争等现实主义因素来进行解释。但是如果深入探究，双方的利益依据是什么，这种关系困境的持续存在并不符合双方的利益。若以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中日关系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今日之窘境，乃是由于两国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以及对他者的映射出现了的滞后性或保守性，并在此基础上发生了认同危机。”

摘要：论及影响中日关系的诸因素，学者多从安全困境、经济依存、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美国因素、能源竞争等现实主义因素来论述。但若换个视角，以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为依据，以中日两国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建构以及互相映射与互动，和基于两国身份上的认同，来试着分析身份建构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来解析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变化，问题似乎就变得比较容易理解。

关键词：中日关系 身份定位 认同危机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亦被中美关系取而代之，但中国的战略依据如转向海洋，中日间的龃龉不断始终让中国觉得如骨鲠在喉，通向海洋之路不那么顺畅。与此同时，如果日本仍以美国马首是瞻，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那么，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其是否会感到力不从心，或压力倍增，两国战略对抗性是否会相应增强？然而，两国关系的这种趋势是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但是，扭转这种趋势，对两者来说似乎又比较困难，那么其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友好与利益共存为基调的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中日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以及战略上的竞争关系不断明显化，并且在国民层次上形成了极易感情化的倾向。可谓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摩擦不断，冷暖变换；让人深感忧虑，不知中日关系到底将会走向何方？

对中日关系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学者常以“囚徒困境”、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美国因素、能源竞争等现实主义因素来进行解释。但是如果深入探究，双方的利益依据是什么，这种关系困境的持续存在并不符合双方的利益。若以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中日关系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今日之窘境，乃是由于两国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以及对他者的映射出现了的滞后性或保守性，并在此基础上发生了认同危机[11]。

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不仅把国家视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还赋予其单个人的特征，如身份、利益与意图等[2]。而国家的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来源于国家行为体的自我定位和所具特性。但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行为体，国家的身份特性又需要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再现，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因此，身份又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可以说，行为体身份是有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3]。而利益是行为体的需求，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因为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无法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并且，利益只有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展现。国家行为体正如社会中的人一样具有多重身份，因此也享有多种利益。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机。由行为体的行动，可推理出其背后的利益动机，而利益背后则是深层次的身份依据。

而认同则意味着“同一”，首先意味着自我与自我反思的统一。因此，这要求行为体对自我的存在要有一个客观、清晰与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身份定位。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我或者自我与他者的认同。而自我与他者的认同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为他者，已经是一个整体了。[4]可见，行为体间的认同应以自我认同为基础，因此，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定位或建构将会对行为体之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二

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地区环境与中日两国自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不断在从事于和平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设。日本也在不断走向“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的道路，也就是由“经济大国”向“政经大国”迈进，并在国际外交和安全领域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但两国又共同面临着一些问题，国际上，诸如美国对两国以及两国间关系的影响，两国间如何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如何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与地位等。国内，诸如中国面临着，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经济与社会安全问题等；日本面临着，经济停滞，政治不稳，政府或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受到挑战等问题。

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促使各个国家行为体对国家关系的实质和国家间互动模式进行新的思考，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进行新的定位和再审视。地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变动，也需要中日双方对自己与对方进行再认识。

自身以及环境的迅速变化，致使中日两国的在国际与地区中的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转变；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变化，也需要两国对自己以及他者的身份重新审视与定位，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如果身份定位滞后于环境的变化或模糊不定，或对对方的变化视而不见，依旧以原先的方式再现之。那么行为体之间常常会发生认同危机，从而引起两者间关系的反复与恶化。然而，对自身身份的清晰再定义，以及对他者的正确再认识或再现，相应需要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自身与他者当前关系所依据的战略前提认识的转变。但是，如果这种转变不符合行为体的愿望，或者行为体想维持其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身份和地位，或者由于行为体的保守或惰性，结果是行为体往往不乐于做出转变，而愿意保持其以前的实践和习惯。特别是此前比较成功的行为体。为了不使身份发生自己与他者都难以接受的变化，或者说为了维护稳定，行为体常常为自己和他者重新设定一个简单明了、易于接受，最重要的是，依过去的相互理解为基础的身份。

自身与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行为体却以刻舟求剑的方式为自己或他者谋取个身份。当然，这种身份就无法适应环境的需要。行为体这种保守的态度，也无法成功解决所面临问题，只能使问题越来越糟。

三

中日之间之所以出现身份定位的偏差与认同问题，这也与冷战后影响行为体身份定位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关。冷战结束后，在影响行为体身份的内部与外部结构两种因素中，内部结构的影响性增强，而外部结构的影响程度相对减弱。这是由于，两极体系结构的解体，而新的体系结构尚未形成，国际体系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中。同时，由于行为体间实力的相互消长，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处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很难依据体系结构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但是，身份的模糊或缺失，就使行为体的利益与行动失去了依据与方向。所以，为了给予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使利益与行动有所依，内部结构与行为体间的互动对身份的影响作用就加强。

在日本的诸多自我定位中，有一种身份不容忽视。这就是其基于地理位置上的“海洋岛国”身份。虽然不能机械的接受环境决定论，但是一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对该国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以及国家地缘战略的影响绝不容忽视。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国家的地理位置即使不是最终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行为 。日本的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加剧了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通过研究空间关系与冲突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欧洲体系中，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冲突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5]。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也证实了这种推论具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中国的地理特点虽然海路兼具，但在传统上却是个大陆国家。这种“海路对立”的西方传统地缘战略，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日本，仍在起着严重的误导作用，日本一些人仍对此津津乐道[6]。如果日本突出自己海洋国家的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国家战略，把大陆国家中国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中国战略依据向海洋的转移，日本必然会在亚洲乃至世界极力限制中国，这势必会对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在钓鱼

岛问题上先入为主，步步推进，并与中方在海洋上摩擦不断，就可证明这种身份对日本行动的影响。

虽然，依据不断变化的自身以及国际环境，使得一个行为体对自己与他者的身份进行明确的定位非常困难。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身份具有历史继承性，并且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很难瞬间转变。Rose 还认为，对对方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的理解，对自己所经历的过去以及共同历史的解读，也是影响行为体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7]。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其实就是双方对共有的历史的解读产生了分歧，也就是一方对对方在历史事件中的身份定位不能认同，产生了认同危机。对于中国，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余的屈辱史。在这百余年里，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欺凌与宰割，显然是个“受害者”。正是这个受害者的身份，才使得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并与 1949 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这个身份在整个民族认同与国家团结、统一上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现今作用依然不容小视，并常常为政府用做增强民族团结的有效手段。而同时，日本的身份也相应而产生了。从历史事实上讲，日本显然是中国这一耻辱身份的主要制造者，那么日本的身份就被定格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或侵略者。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两国都能接受以上的历史身份定位。并且，两者都名副其实，不容置疑。

但在冷战后，由于国内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想成为“正常国家”或“政治大国”与国内政治的需要。日本政府或一些政客们三番五次试图想改变过去这种不光彩的身份，提高自己国家的形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因为，自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经济停滞不前。经济的不景气，使隐藏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受其影响，政治领域也开始出现混乱，最突出的表现是政治领域维持多年的“五五体制”被打破，政治丑闻不断与首相的频繁更迭。于是人们开始对政治失去希望，政治泡沫也走向破灭。这种对经济和政治的失望也延伸到社会领域，人们开始失去对国家和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对前途也失去信心。于是，出现了“破脚的国家”、“畸形的国家”等对国家的消极认识。[8]

于是就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或通过让邻国更难以接受的方式，国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曾执着的这么做），来美化之，淡化之，或忘却之。也曾试着，从侵略者转变为受害者。事实上说，日本在二战中受到的创伤凿实巨大。从某种视角上讲，在二战中除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外，没有胜利者。无论战胜与战败国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战胜国如中国、英国、法国等，战败国如德国、日本等。因此，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参拜靖国神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强调自己是受害者的实践。

然而，事与愿违。日本这种不恰当或过激的实践方式，这种试图否认历史的行为，不但未能转变自己在中日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中的形象，改变自己不光彩的身份，反而由于行为中触及了历史，唤醒了中国人对以往屈辱史的集体记忆，唤起了自己曾有的受害者的身份。这样，也相应加强了日本的相对立的身份。这种相互对立身份作用的加强，反过来又影响着双方的行动。认同危机，引发了双方的冲突性互动，引起了双方关系的恶化。

而且，美国对中日两者关系的影响，也与日本一直是美国的战略盟友这一身份有关，并且，日本的自我定位缺少自主与独立性，一直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一直决定着中日两者间关系的走向。

四

中日身份定位的历史性、保守性、滞后性，加强了两者的冲突性，造成了两者的认同危机。行为体之所以出现身份定位滞后，还与其对所处环境的保守性理解有关。

地区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地区间相互依存的加强，可以说是惠及两国、地区与世界。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每年以 10%左右的速度增长，不仅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奇迹。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给东亚经济注入活力，而且促进了地区物质、人员与技术的流动，给邻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然而，曾经创造亚洲经济奇迹，为多国经济所仿效，自诩为亚洲经济奇迹代表的日本，不但不认为这是本国经济发展的机遇，而且还认为这难以接受，是对本国经济竞争与挑战。虽然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在加强，但相互依存也存在敏感性与脆弱性[9]。在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经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却出现了停滞，这也相应增加了其敏感性与脆弱性。出于自身经济安全与能源供应的需要，日本认为中国是其在能源领域有力的竞争者。因为，由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对能源的需要也与日俱增，对石油与天然气的进口数量也不断增大。同时，日本由于自身能源的匮乏，也需要进口大量的石油与天然气。然而，通过海上运往中日两国的石油能源一般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域，因此，两者的在能源安全上的需求加剧了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

中日间认同危机的加剧，也与两者间的战略实践有关。依照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行为体的身份还具有行为体间特征。一行为体的身份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才能得以再现，而行为体的互动方式也加强了行为体身份中相对应部分。这就是个体与结构的互构关系[10]，行为体间的互动方式，建构了相互间的关系结构，而结构反过来又加强了行为体的身份。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一些反华势力就想当然的把中国设想为取代苏联的战略威胁。在 1996 年，日美重新定义了其安保条约，确认了在“周边事态”发生时日美安保的行使等。1997 年 9 月，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确定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即所谓的“新指针”。该指针规定了在日本的周边区域发生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时的合作。虽然指针中对“周边”的解释模糊，但事实上，台湾海峡是包括在内的[11]。2004 年 12 月，小泉内阁的内阁会议决定了“新防卫大纲”，并在其中第一次提到了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警惕。2005 年 2 月，外长、国防部长组成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即所谓的 2＋2）在华盛顿召开，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在其安保问题的相关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写入中国是日美安保的对象。而且，除核武器外，在常规武器方面，日本也堪称是军事强国。并且，伴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进入二十一世纪，日美同盟也处于一种“历史性回归性变化”[12]过程中，这很可能引发和加深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矛盾。

与此同时，中国也采取了一些相应性互动，如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逐年增加军费开支等。虽然，中方认为此乃正常之举，不足以为惧，但至少日方却不这样认为。

行为体的行为再造了行为体本身与他者。在行为体的实践中，行为体假定他者是有目的的行为体，并与之相互依赖。这样自我与他者就处于对立统一中。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在再造了自己的同时，也再现和再造了他者。所以说，中日关系今日之窘境，中日间的认同危机，也是两国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

五

中日间的认同危机与战略困境，对两国人民来说是一种遗憾，对两国政府可谓是巨大挑战。然而这种困境的产生与两者的身份定位与建构，可以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破解这种认同危机，需要双方的重新自我定位与再现。需要行为体对环境、自我与他者的再认识，以及行为体间的自我约束与良性互动。

如果有了认同动机，自我约束就会在促其实现上面起到关键作用[13]。自我约束，需要中日两国的政党以及人民，认清时代的潮流，捐弃前嫌，互示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与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生存权利与安全利益。特别需要两国的执政党和领导人，特别是一些政客保持理性，别再感情用事，别再做出有违时代潮流，有损两国人民利益的事。

而且，行为体又非仅仅是具有理性的自由“经济人”，它是自我与社会建构的结果。它拥有自己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历史与传统；它仍拥有基于族群关系与互惠、互动基础上的朋友与敌人。这样，它就懂得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应该忠诚于谁，应该对谁负有责任。

正如“叙事式自我”所描叙的：自我并非凭空出现和自由的，而是受限制的个体，他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前，首先应该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的一部分”，知道自己的身份与历史，然后才能知道自己应对谁负有责任，应该怎么做。我想，只有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方，认真、客观地了解自己的出身与历史后，双方才能明白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知道自我与他者的故事应该走向何处，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参考文献】

[1] Christian Wirth. China, Japa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views of ‘self’ and ‘other’ from Beijing and Tokyo[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ume 9 (2009). pp 469 - 496.

[2]【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272 页。

[3] 同[2], 第 282 页。

[4]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229.

[5]【美】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第五版）. 阎学通, 陈寒溪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12, 第 183 页。

[6] 刘江永. 中日关系二十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第 418 页。

[7] Rose, C.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acing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 [Z]London/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5).

[8] 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6,第 48—54 页。

[9]【美】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利与相互依赖[M]. 门洪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2, 第 12 页。

[10] 同[2], 第 215 页。

[11] 【日】毛里和子. 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M]. 徐显芬译.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2, 第 119 页。

[12] 同[6],第 235 页。

[13] 同[2], 第 215 页。

（张少峰, 国际关系硕士。本文原载于《学习月刊》, 转载于爱思想网。

原文链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320.html?page=2）

【返回目录】

11-11 余杰：祈祷和平



“友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对抗，也许两家都不愿意；而如果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情，无法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连并立的资格都没有。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也没有用。”

一九四六年，《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到日本游历之后，对国人发出警告说：“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困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之中总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气。”

作为一名优秀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芸生将中日两国的现状作了一番切实的比较：“凌空观察，投降之初，日本人对中国有一种模糊的钦崇，以为中国毕竟是了不起的大国，八年战

争不屈，终使日本失败了。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对于日本人看待中国的态度的变化，中国人自己是否应当引起某种警觉和思索呢?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祸福命运。而顺逆成败，则又取决于这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近代化的适应能力一直落后于日本。半个多世纪之后，王芸生早已去世，但他对中日两国发展轨迹的预言却不幸成为了现实。

法国人施赖贝尔也有相似的预言：“寂静的黑夜笼罩着日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没有落到如此彻底的失败。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将从这堆灰烬之中，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这一天留给它的一切中获得新生的话，那将是另一个日本。”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上发奋图

强，抓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球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型的机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重新进入全球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饱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之苦，在抗战胜利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开始迟到的改革开放。此时，中国已被日本远远地抛到了身后。

日本的领土面积为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还没有黑龙江省大。日本的国土中百分之六十为山地，自然资源极度缺乏，地震、台风、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极为频繁。然而，在二战中惨败的日本，不仅没有陷入长期的穷困，反倒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就崛起为经济和科技大国。

从古代以来，日本人就一直以“追赶、超越”的精神来对待比自己先进的文明形态。在古代，日本把中国当作老师；在近代，日本把荷兰当作老师；在现代，日本把美国当作老师。这是一个善于使用“拿来主义”的民族。

日本在“国际交通安全学会”发表的“社会速度指标化”中公布，世界上步行速度最快的是日本人，其中大阪人又居世界第一位，每秒一点六七米；东京人第二，每秒一点五六米。与之相比，巴黎人不过每秒一点四六米。步行速度极具象征意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人显然不仅仅是步行的速度很快。

一九五二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当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智利和马来西亚还要低。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就已经超过了古罗马的后裔意大利；一九五八年，日本又超过了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过的榜样——欧洲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一九六九年，日本再次超过了曾经发明生产流水线而震撼世界的工业强国德国，真正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的国家。不久，日本即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五万亿美元的惊人成就。这一发展速度确实是一日千里。

今天，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科研投入在全球名列前茅。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索尼、东芝、佳能等跨国企业，无论在科研水平还是在管理运营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已经在汽车和钢铁生产领域超过了自己的良师美国。日本拥有

的外汇储备高达三千六百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是仅次于美国、欧洲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这一地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撼动。

中日两国的经贸极具互补性。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以来，中日两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

中日贸易额从一九七九年时不足七十亿美元，到二零零二年已经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九亿美元。对于中国来说，日本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就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四分之一的比重，日本还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中国还是重要的对外投资国。近十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已达两万三千多个，实际使用金额四百亿美元。

日本的一千家大公司中，已经有四百二十家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世界三十一个国家进行“全世界商业成本比较”调查表明，中国排在第二十八位，接近于成本最低的国家。据日本贸易振兴会二零零一年版的《投资白皮书》调查显示，百分之九十五点五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是海外投资的理想国。”许多制造业计划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将其生产能力的一半转移到中国。

日本还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贷款属政府开发援助性质。截至二零零二年底，日本累计向中国承诺政府贷款两万九千五百零四点八九亿日元，项目达一百九十九个。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一千两百七十九点七二亿日元，用于一百一十九个项目的建设。日元确实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今天，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家中没有中国制造的服装和玩具的日本城市居民家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家中没有日本制造的日用电器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忽视对方的存在。

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每年平均百分之八左右的增长，都为日本企业提供了一个前程似锦的运转舞台。前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白田山认为：“不应

当把中国大陆的发展看成威胁，应该把中国大陆的繁荣与发展看作是日本自己的繁荣发展，因为中国大陆的发展也会给我们带来利益。”

中日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反过来，经济的共同繁荣又成为联结中日关系的纽带，并成为东亚地区稳定、发展的基础。

然而，中日两国之间仅有经贸的合作是不够的。多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异常冷淡，两国国民之间也远未达成起码的理解和友好。中日两国要成为亲密的盟友关系，还要克服很多障碍、还要越过很多鸿沟。

据《中国青年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的被调查者中，认为日本“坏”和“特别坏”的中国人高达百分之四十二。而日本首相府外交舆论调查则表明，对中国有亲切感的日本国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经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到了一九九六年跌至百分之四十五以下。一九九七年，对中国人没有亲切感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有亲切感的人数。

上述调查无可回避地表明：中日两国甚至在多数普通国民的层面上，已经形成了互相厌恶的情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为和平、友好而真诚祈祷，我们更要为和平、友好创建牢固的根基。

居家过日子，要是邻居令人厌恶和畏惧，如果无法让他走开，那么最多我们自己搬家走开就是了。然而，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即便谁都不认为对方是个让人喜爱的芳邻，却注定了谁都无法让对方搬走，自己也无法走开了事。因此，无论是厌恶也好、喜爱也罢，中日两国都无法回避、漠视对方，无法在与对方打交道时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

既然我们无法回避日本的存在，就应当了解和研究这个与我们有着上千年复杂纠葛和恩怨情仇的邻居。对于中国来说，或许最应该、最重要、也是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客观地了解、研

究和认识对方，理性地把握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辱骂、仇恨和敌视，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会对我们自身造成重大的伤害。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写过《菊花与刀》，欧洲作家小泉八云写过《日本与日本人》、韩国教授李御宁写过《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它们都成为外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而作为近邻和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迄今为止却没有写出一本举世公认的研究日本的巨著来。

相反，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无论是文学、政治还是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竹内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沟口雄三、安丸良夫等日本学者，都取得了让我们本国学者汗颜的卓越成就。

曾经拍摄过电影《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说过："我对日本民族本身并不反感，但对他们的做法感到愤怒。我们要小心他们，更要研究他们。"

我们一方面恐惧日本的野心，另一方面却羡慕日本的财富。我们一听见日本侮辱中国的事件就情绪激昂，一看见日本价廉物美的商品就眼红心跳。

但是，日本的历史传统、国民性格和社会结构究竟是怎样的？日本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日本未来经济调整和政治发展的走向究竟如何？对于这样一些并不复杂的问题，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加以回答。这种现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危险：不了解的对手，是难以战胜的对手。对敌人的蔑视，是一种只有在"知己知彼"之后才能摆出的资格。

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和研究处于"虽近实远"的状态，甚至远远比不上对欧洲和美国的了解和研究。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普通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却仅仅止于相扑、艺妓、插花、索尼电器、丰田汽车、村上春树的小说和青春偶像剧。

但是，我们必须直面一个现实中蠢蠢欲动中的日本，我们必须洞察日本的精神内核和政治走向。这一切又得依靠实证研究，而不是想象和臆测，正像姜文说："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

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中国要赢得一个同日本友好相处、平等相待的地位，首要的问题是让自己早日成为一个现代、富裕、文明、民主的亚洲强国。中国的知识阶层要警惕民族主义、闭关锁国主义、复古主义和和反现代化的思潮，坚持致力于人道、和平、民主、自由、博爱这些先进价值观的阐发，使中国尽早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潮。

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中日之间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竞争将难以避免。但是，这种竞争应当是和平、友好、互相促进的竞争。“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都有其相当的片面性。昔日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悲剧，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日本人民，谁都不愿意看到。

中日之间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中国自身而言，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强大起来。所谓“强大”，必须包括经济水准的飞跃、政治制度的革新、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等诸多方面，而不仅是一个多世纪之前满清帝国的洋务派所说的“船坚炮利”。

仅有“船坚炮利”的强大绝不是真正的强大，近代中国血的悲剧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北洋舰队的实力在日本舰队之上，但没有“人”的现代化，这支“硬件”好、“软件”差的庞大舰队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士兵们在炮台上晾晒衣服，即便是邓世昌这样的优秀舰长，也将宠物带上军舰照料。观察到这些细节之后，日本的谍报人员便确信，日本舰队一定能获得胜利。

一个国家的振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谈到日本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根本原因，东方人和西方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教育。日本的经济奇迹，确实得益于完善的教育体系和由此培育出来的高素质的国民。

一个举世公认的观点是：教育是一个国家能否建设成为文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教育战略的竞争，就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早在上个世纪初，日本文盲率就几乎降到了零。“明治维新”中颁布的《学制》中明确指出，要让整个日本“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

今天，日本适龄儿童与少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小学教育和百分之一百的初中教育，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初中生入高中学习，百分之五十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学习。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八。日本的终身教育也非常普遍，许多七八十岁的退休老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电脑和外语。

日本有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八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日本已经制订计划，在未来五十年中，将此人数提高到三十名。日本科技人员的总数，按照万人人口和万人劳动力比例两种口径计算，从一九八六年起就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每年专利申请件数维持在三十九万件上下，也居世界第一位。

然而，中国的数据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一九九二年度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二点五，这一比例到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更是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世界一百五十一个国家中，名列第一百四十九位。

中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贫困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十。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四，也就是说全国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孩子没有读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二，即使完成国家“教育发展纲要”的计划，仍大大低于世界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的平均数百分之十六，更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的百分之四十二相提并论。直到今天，人口十倍于日本的中国，仍然与各项诺贝尔奖无缘。

当日本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的赔款大部分用于基础教育的时候，中国刚刚启动的戊戌变法却把教育的重点放到了创办京师大学堂上。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也许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也许是出于好高骛远的理想，企图一下子就兴办起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来。他们却忘记了一个最简单

的常识：空中楼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普遍而高水准的基础教育，孤零零的几所贵族化的大学无法对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发挥良性的作用。

历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决策者们似乎仍然没有吸取这一前车之鉴的教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之中，并大肆宣传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方向，使得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雪上加霜、步履维艰，使得九年制义务教育几乎形同虚设，使得几乎大部分城乡民众都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

当中国许多一流的学者盘踞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时候，日本大量的知识精英都走向中小学的课堂。他们不认为当中小学老师是大材小用，他们深知这一职业紧紧关联着国家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南亮进认为：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八十五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五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一九二五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六十五年。

可以断言：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最为失败、最为历史所诟病、也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社会发展产生最为深远的负面影响的一个领域。

可以断言：中国如果不在教育方面赶超日本，在其他方面则很难有胜算。

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了三千三百一十七亿美元，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万亿美元以上，仅此一项就超过了中国当年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国民银行存款总额为七点七万亿美元，约为中国当年国民储蓄总额的十倍以上。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一千两百万亿日元，住宅资产和社会资产也有一千万亿日元以上。

一九九九年，日本提供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超过二点九亿美元，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世界第一位。这是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经常由一位日本女性出任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争取其国际地位的利器。日本交纳的联合国会费也名列前茅，因此积极运动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近年来，日本在不停哭穷、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时，静悄悄投到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已经高达一千兆日圆，折合七十万亿人民币左右。据中国经济学界估算，到二零零一年，中国社会总资产大约在三十六万亿到五十二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就是说，即使日本过去的工业基础为零，用这笔真正的巨资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已经超过了中国社会资产的总和！

日本有理由为自己在亚洲率先向现代化转变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骄傲因为忽略了在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升华道德的关怀、人类的关怀的必要，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的历史，说明人类的自我完善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就像个体灵魂的拯救一样，人类的自我完善必须也只能依靠各民族的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制。虽然日本抢先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但种种历史的曲折表明，日本国民并不会因经济进步而自动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近年来，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投毒案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贪污贿赂丑闻等，充分地呈现出日本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弊病。据日本官方调查，奥姆真理教曾在非洲购买细菌设厂繁殖，计划在东京施放，预计杀人百万，借此引起社会动荡并伺机夺取政权，并将其权力施于海外。

日本虽然是亚洲政治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但其财阀政治的本质依然隐患重重，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格局也难以改变。日本的政治还停留在少数特权阶层和政客家族争权夺利的阶段，远未进入社会秩序的责任伦理看护的领域。对内缺乏开放和透明，对外也缺乏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扶助和关怀。

在世纪之交，“日本综合症”让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警醒和反思：财政的重建、行政机构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率的上升以及人口老华、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过去十年的经济停滞，被日本人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就在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时候，日本的整个社会依然处于上下互不信任、人浮于事、人心涣散的状态。日本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领域的对应也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支撑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即提供资金的银行、从事生产的企业以及购买产品的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找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出现了地价和股价大暴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未能发挥人们期望的正面影响力。相反，有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大名鼎鼎的八百伴百货公司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象征着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在经济危机的背后，更严重的是人的危机。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大部分中产阶级单纯追求个人享受，对周围的人群漠不关心，年轻人中传统的认真敬业的精神变得淡薄，新闻媒介依附于权力和资本丧失了监督的理念，教育上出现精神空洞化和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的课堂崩溃。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国民精神的自我完善，还必须通过一次次对历史的自我检讨，以及对现实弱点的诊断和治疗，不无痛苦地来完成。

那种认为历史检讨会带来“民族自虐”的观点，恰恰是对本民族自救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正是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最大的病根。

二十多年以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发现了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地位，他指出：“日本似乎在亚洲逐渐孤立。我会见的所有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不认为日本是朋友。”这种暴发户式的孤立是日本自己造成的，它既对日本自身的和平与发展不利，也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不利。

施密特认为：“虽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日本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邻国缺少朋友这个事实，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与此同时，由于日本认为不对他人的侵略和暴行表示道歉就可以过关，又给它要在邻国建立信任的努力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作为旁观者的施密特的这番真诚告诫，被多少“身在庐山中”的日本人听到了呢？

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就像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样，纷争不断、战火连绵。中国、日本以及南北韩之间的和平共处，一直是善良的人们的梦想。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日中关系的稳定是亚洲和平的基石》的社论。这篇社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日两国国民的想法：和平是两国国民共同的事业，维护平等、健康而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都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两国应当走出一条“双赢”的道路来。

我们应当意识到，作为邻居的日本，其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其保守势力不承认战争罪行、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侵占钓鱼岛等等，而在于它那理性的国家管理、成熟的社会机制、高素质的国民以及深谋远虑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

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当中国正在与俄罗斯谈判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石油资源的时候，日本后来居上与俄罗斯达成了共建

石油管道的合作计划；当中国刚刚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将东盟各国首脑邀请到东京，以巨额投资和经济援助吸引东盟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中日之间在国际舞台上激烈竞争的态势隐隐形成。

中日之间，既有值得怀念的友谊，也有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假如这一切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开始算起的话，这份沉重和复杂就几乎无法摆脱了。如果我们再放宽历史的视界，从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的时候算起，两国的密切交往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其间，老师与学生的身份发生了巧妙的错位，兄弟和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奇特的置换。

悠久的历史只有成为反思的资源时，才是值得宝贵的财富；深重的苦难只有成为奋起的动力时，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

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敬和重视，第一步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具有公民素质和文明意识、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写的“人”。正如五四运动的旗手、启蒙主义的先驱胡适所说：“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

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现实呼应着历史，历史启示着未来。

未来，在中国与日本的相互关系中，只能有三个选择：友好、对抗、并立。

友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对抗，也许两家都不愿意；而如果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情，无法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连并立的资格都没有。

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也没有用。

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做好自己的事！

我们能做好吗？

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

让答案在每一个人心中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让答案在每一片土地上像花朵一样蓬勃绽放。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烈们；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个人的自由和人权而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先驱们。

（本文节选自《铁与犁》。余杰，作家，著有《火与冰》。
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7676）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缪莹：钓鱼岛争端——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动用武力？

领土争端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可能导致武力争端的问题。在钓鱼岛事件骤然升温的当下，或许很多人会问：如此重要的争端问题，为什么日方和中方都从未动用武力解决？事实上，学者们也普遍认为，到目前为止，钓鱼岛争端并未升级，实在是一个“奇迹”。美国学者 M. Taylor Fravel 曾在 2010 年对这个问题做了简单讨论。

为了研究这种特殊的现象，Fravel 主要将目光放在中国，因为中国有能力解决领土纠纷，也的确曾经使用过武力解决其他领土纠纷。其次，Fravel 认为，中国的确可以利用武力征回钓鱼岛加强自己的地位。而作为“防御者”（defender），日本没有必要主动武力出击，但在一定情况下，武力防御也是有可能性的。Fravel 认为，中日双方迟迟没有动静主要出于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钓鱼岛“三方舞台”的威慑作用。一般而言，领土问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但钓鱼岛问题是三方舞台：倘若日本与中国的争端升级，由于 1960 年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美国也不会袖手旁观。Fravel 认为，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做到在夺回钓鱼岛的同时守住一切有可能的反攻，不将事态搞大。在东亚，日本的确拥有强大的海军，而中国仅有的几次武力领土争端都是针对并没有多少海军的国家，如越南。更何况，日美安全条约对中国的震慑作用恐怕比日本海军力量要大，毕竟中国并不想和美国打仗。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从 1972 年起便“实际占有”了钓鱼岛，拥有实际上的管理权。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一方占有领土的时间越长，对另一方夺回领土就越不利，所需的花费也更

高。一旦中国真正发起挑战，国际社会将很有可能将其看做“修正主义”（revisionist），并加以谴责。也就是说，在一方占有的情况下，会加深国际社会对不要改变现状的偏见（在 1962 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武力上取得了胜利，但最终退回了战争爆发前的边界领地上。）

第三个原因是中日双方在亚洲的地方性竞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日双方都希望在东亚可以保持一个好的名声。中国现今的发展和外交政策十分注重“和平发展”以及让周边“安心”的保证，倘若运用武力，将会让人怀疑中国长久以来发展的目标和动力，进而影响大国名誉。

第四个原因，也是 Fravel 最想指出的，是中日双方一直在努力以非武力的渠道解决钓鱼岛争端，或者说，在努力将争端保持现状而不升温。让钓鱼岛事件升温最快的方法无疑是民间人士登岛，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而在 Fravel 的论文刊发之时，钓鱼岛的所有权还在所谓的日本民间人士手中。倘若日本政府允许日本民间人士登岛，那么中国的保钓人士自然会奋起而争之，进而使争端激烈化。从 2002 年起，日本政府控制了钓鱼岛不被私人“所有”的三个岛，从而避免了任何一方的保钓人士登岛，同时也避免了日本激进分子使用钓鱼岛而达到政治手段。04 年，日本在钓鱼岛附近放了两艘海监船，次年，又控制了岛上的灯塔。尽管这样的举动使得北京和台北爆发抗议，但在 Fravel 看来，日本此举反而使得事态平静下来，因为它控制住了争端中最激烈，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间保钓人士。的确，从新闻来看，日本保钓人士从 03 年起就没能登岛过。

其次，Fravel 指出，中国一直在避免在钓鱼岛事件上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尽管当事态激化时，当局允许群众游行抗议，但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严重度来看，都是十分保守的。当 05 年反日情绪高涨的时候，钓鱼岛也没有被官方用作火药。

再者，尽管日本从 72 年开始就控制了钓鱼岛，它并未大幅度地利用岛屿，也并未开发过钓鱼岛。日本并没有在钓鱼岛上建设军事措施——尽管这样会加强它对钓鱼岛的控制，但会引

起北京的警觉，并有可能使事态激化。实际上，中方媒体在用词上会区分日方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以及更有侵略性的“侵占”或“占领“－－后者需要军事措施的建立才能成立。

最后，每当事态激化，或者中国保钓人士登岛，美国都会出来发表声明，表明他们的态度：在对钓鱼岛主权保持中立的同时，确认钓鱼岛属于日美安全条约保护之下，希望可以达到震慑的作用，使事态降温，和平解决。

尽管努力避免使用武力，但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也都不愿退步。

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钓鱼岛的重要性：谁拥有了钓鱼岛，谁就能得到更多的东海主权，而东海下人尽皆知有石油。从军事角度来看，钓鱼岛也可以作为发射反航船导弹的基地。在国际社会上，一块领土越是重要，双方在和谈之前越是要斟酌一番，以免造成不可挽回和改变的局面。对日本来说，推迟和谈对自己更有利，因为国际社会的“保持现状偏见”会更有利于现有实际控制权的一方。而对中国来说，由于现在情况对自己并不利，推迟和谈或许是在等待机会，等待事态的扭转。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宣示不需要很大的精力：只需要外交方面发表声明就可以了。在当今情况下，中国无需急着解决问题，可以等待更好的局面出现。

另外，无论是中日两方哪一方做出退步，其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由于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无论哪一方放弃对钓鱼岛主权的声明，在国内都会引起激烈反响，进而影响到领导人的名声。由于中日在东亚的竞争，无论哪一方先做出退步，都会被国际社会看做示弱，不利于国家的名誉。中日双方在东亚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都很难做出退步－－在 Fravel 看来，唯一的可能性是：倘若未来有不可解决的能源危机，那么两国有可能合作开发和分配东海的石油。

综上所述，钓鱼岛争端一直保持现状到如今的主要原因是中日美三方的互相震慑，各自保持现状的努力，以及坚持不退步的决心。这些原因使得钓鱼岛这个不稳定因素在东海上稳定地存在了这些年。不过，早在 10 年 Fravel 就认为，倘若事件如此发展，钓鱼岛“稳定”的争端政策可能会起变化。事到如今，钓鱼岛争端再次升温，这一长达几十年的争端究竟该如何解决，是否能够解决，我们继续等待答案。

【参考文献】

“Explaining Stability in the Senkaku (Diaoyu) Dispute,” M. Taylor Fravel, in Gerald Curtis, Ryosei Kokubun and Wang Jisi, eds., 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 Managing China-Japan-US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本专栏由政见 http://cnpolitics.org/供稿。）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中日钓鱼岛争端

9 月 14 日下午，@新浪传媒 证实，网传的“9 月 16 日--18 日三天，CCTV-1，CCTV-4，CCTV-新闻 3 个频道停播**日本**企业广告。”同时出版界人士也证实涉日书籍的出版被停止，这些书籍包括：1.涉及日本作家；2.从日本引进版权的；3.国内作者所作的关于日本的选题。
新闻：http://fmn.cc/Qnyadg

同时 14 日有媒体报道，**北京**有人到日式烤肉店抗议，餐厅急写“保钓标语”求自保。该店店主@闪辰晖 在微博上回应此事，称店里没有事情，当时是“一帮人在店里吃完饭突然就举起国旗叫嚣喊起口号来，闹事儿以后直接没买单就走人了。
新闻：fmn.cc/RVX6Zz
http://fmn.cc/Qnyadg

上周末之前，日本总领事接到共 6 件日本人在**上海**受害的报告。据称一名中国人走向几名正在路上行走的日本人，把汤面泼到了一个人身上，并打碎了另一人的眼镜。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个开着电动汽车的人把车停在一名行走途中的日本人面前，并朝他脸上扔了一瓶碳酸饮料。还有日本人遭到了中国人辱骂，中国人骂日本人是“蠢货”，并拿塑料瓶砸向他们。此外，有人被问是不是日本人，然后被踢了很多脚。
新闻：fmn.cc/PyfgQJ
http://fmn.cc/Qj5x0x

本周**中国**的反日活动相较上一周有所升级，上百个城市出现了反日游行，其中不乏过激行为。9 月 15 日的这个周末，中国超过 50 个城市同时发生了反日游行，如此大规模、多城市统一进行的示威活动，被官方称为是中国民众自发组织反对日本购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同时多个城市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令民众倍感恐慌。
新闻：http://fmn.cc/SpWwzD

长沙、**西安**、**青岛**、**苏州**等等，在 15 日的反日游行中，数个城市的行动升级为暴乱，其中不乏对普通人驾驶车辆进行打砸抢烧的行为，同时，青岛开发区多间日本工厂和汽车 4S 店被烧毁，数个城市的日资百货被打砸抢掠。失控的抗议不仅使得日本民众感到担忧，大量中国人目

睹上述场景后，也不禁开始担心。
新闻：http://fmn.cc/SpXxH0
视频：http://fmn.cc/R8FjQu

9 月 18 日晚，一名来自**西安**母亲的微博引起了网友的注意，这名母亲表示，9 月 15 日西安反日游行中，砸车者无视她的苦苦哀求仍砸毁了这两日系轿车，车中的 7 岁女儿在混乱中一度走失，现在因受到惊吓而无法和人说话。她放出了砸车者的照片，希望能有线索将他们绳之以法。此前，一名叫@染小柒 777 的网友 16 日曾发消息称，她的叔叔 15 日下午在街头被爱国者打伤，医生表示可能会导致偏瘫，她希望能找到打人者。
新闻：fmn.cc/T2eWNu

据统计，9 月 16 日**中国**超过 80 个城市又同时发生了反日游行，规模不一，相比前一日的大规模暴力打砸现象有所减轻。但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所在的花园酒店被上万抗议者包围，并打砸了酒店大堂。**深圳**抗议者包围了市委政府，直到天黑后才散去，期间警方向人群发射了催泪弹和高压水枪，包括记者在内的多名人士受伤。
新闻：http://fmn.cc/QnyUyS
http://fmn.cc/QSUU4t

9 月 15 日，**西安市**的反日游行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尤以市中心的钟楼饭店受到的冲击最严重，西安警方虽出动大批警力，但令人费解的是完全没有控制住局面，还对市民称没有打砸情况。16 日钟楼饭店的集会还在继续，西安则发布通知称今后市区禁止任何形式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
新闻：http://fmn.cc/Rg0dYp
http://fmn.cc/RWbouG

因为今年 2 月丢失自行车被民众所知晓的日本青年河原启一郎，计划赴云南彝良震区救灾，但在**贵阳**转车期间却因为是日本人，而遭到 20-25 人的围堵，所幸安全逃离堵截。此事在微博上曝光后，数万中国网友留言，向他表示了歉意。北京还有一名韩国女孩因被误认为日本人而受到恐吓。
新闻：http://fmn.cc/P1u4oj
http://fmn.cc/P1tQgS

中国反日情绪高涨，在华日本人的处境也受到关注。**上海**市警方指出，在地铁里说日语非常危险。**苏州**的日本人学校和上海的日本人学校高中部开始研究采取停课等措施。日本人主妇们开

始大量采购囤积食品以避免外出，部分日企开始暂时撤离日籍员工及家属。
新闻：http://fmn.cc/OGtkUa
http://fmn.cc/OCekw1
fmn.cc/Pyscm9

受近期中日关系趋紧影响，佳能、松下和狮王在**中国**的工厂从 16 日起暂时停工。同时 18 日由于恰逢九一八，位于成都和北京的所有伊藤洋华堂和 7-11 便利店会临时歇业。三越伊势丹控股决定成都和沈阳的百货店歇业。罗森也决定当天上海市的约 20 家便利店临时歇业。本田的 5 家在华汽车组装工厂将在 18、19 日两天全部停工，日产汽车、三菱汽车和雅马哈发动机等公司也透露，中国国内部分工厂 18 日停工。北京地区朝阳大悦城 JUSCO 超市，部分 7-11 便利店和优衣库也采取停业措施
新闻：http://fmn.cc/P1uJ99
http://fmn.cc/P1vejw
http://fmn.cc/Pu7AwZ
http://fmn.cc/U6yfV7

9 月 18 日是九一八事件纪念日，虽然已是工作日，但**中国**当天上街的进行抗议的人仍不少，而且组织化的现象更为明显，**广州**的游行甚至长达 9 个多小时。不过中国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上街民众均是自发行为。
新闻：http://fmn.cc/P1w4g6
http://fmn.cc/P1x1F6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周二（18 日）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公车内被约 50 名中国抗议者包围，骆家辉本人在中国安保人员的保护下才进入大使馆。抗议者使骆家辉的座驾轻微受损，但骆家辉没有受到伤害。声明还说，站在大使馆前的中国安保人员做出反应，将示威者从现场驱散，使骆家辉的座驾从另外一个大门进入大使馆。
新闻：fmn.cc/T1Tc4m
视频：http://fmn.cc/P1wmnp

习近平 19 日上午会见了美国防部长帕内塔。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强调日方应悬崖勒马。希望美方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不要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时局更加复杂的事情。习近平还警告日本要悬崖勒马。
新闻：fmn.cc/RvsSsw

9 月 17 日中午 12 点，中国东海区伏季休渔结束，渔民下午将开始出海打渔。官媒称据不完全统计，福建、浙江等沿海省每年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海域作业的渔船有 1000 多艘。媒体开始鼓励渔民到钓鱼岛打渔宣示主权。
新闻：http://fmn.cc/PytBcv

9 月 19 日凌晨，**青岛**警方通报称，对 6 名涉嫌 15 日打砸抢烧违法犯罪人员依法刑事拘留。这些人烧毁了 2 间汽车 4S 店，还有人打砸、抢掠了佳世客商场。广东**惠州**公安局也发布通告称，16 日下午，该市有少数上街游行人员企图冲击东平吉之岛商场、冲入沃尔玛抢夺日货，对 10 多人强制传唤调查。其中有两人被处拘留，其他人员被处警告。**广州**则刑拘了 13 名街头打砸犯罪嫌疑人，还有 5 人被行政拘留
新闻：http://fmn.cc/PFjRgo
http://fmn.cc/PFk5UR
fmn.cc/OGGhgI

王立军案庭审

9 月 14 日美联社报道称，根据成都中级人民法院通告，王立军将在下周二（18 日）出庭受审。此前根据官方的消息，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被控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犯罪。
新闻：http://fmn.cc/NrikxK

英国媒体引述**王立军**的律师王蕴采说法指出，审判是在 17 日早上 8：30 分开始，大约在中午结束。比该法院之前宣布的日期提前了 1 天。王蕴采表示，王立军的审判由 2 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内部的，一部分是公开的。17 日是有关被控叛逃和徇私枉法的 2 项罪名的审理，属内部审判，因涉及国家机密。有关 18 日的庭审是其它 2 项控罪的审理。
新闻：http://fmn.cc/U6jkdA

9 月 18 日早上 8 时 30 分**王立军**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依法审理，境外媒体不得入内，均被统一安排在法院门口拍摄照片。早上 6 点多时，警察已经把成都中院围了 300 多米的警戒线，警车车灯照亮了周围小区，周围小型酒店和超市也被围在警戒线内。
新闻：http://fmn.cc/U6fq4g

9 月 18 日下午新华社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报道，据悉，2012 年 9 月 17 日、18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

权、受贿案，公诉人表示王立军因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轻处罚。央视也播出了庭审现场的新闻，王立军身穿白色衬衣出现在法院上。
新闻：http://fmn.cc/V6NQSt
视频：http://fmn.cc/Nz69yZ

新华社 19 日下午发布报道，其中提到了谷开来杀害英籍商人海伍德后，**王立军**及其下属掩盖案件的行为，以及王立军如何同薄熙来夫妇发生矛盾的过程。王立军和薄谷开来的关系在去年 12 月 14 日因王训斥属下的消息传回重庆而出现转折。特别是今年 1 月 29 日，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耳光后，导致双方翻脸。报道中还提到，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曾出资 285 万为王立军在北京购置了 2 套住房。
新闻：http://fmn.cc/S78oKT

新华社这份报告是目前中国政府给出的、最明确暗示**薄熙来**曾试图干预警方调查谷开来的书面材料。华尔街日报引述律师的说法称，薄熙来可能会为此面临刑事指控。这是中共领导人可能倾向严惩薄熙来的最新迹象。薄熙来今年 4 月因没有详细指明的“严重违纪”被免去党内职务，接受调查。但中国政府尚未宣布他是否也将面临刑事指控。
新闻：http://fmn.cc/UfbIW5

重庆警界 7 名高官相继落马后，有媒体刊登了他们从被提拔到落马的报道，这些警员大多从基层做起，曾在打黑等行动中做出过突出成绩，但最终因包庇罪犯而受到了惩罚。
新闻：http://fmn.cc/Nz78iV

本周其它重点新闻

9 月 7 日发生**云南彝良**地震对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影响，有报道指出，灾区部分儿童没吃过方便面，甚至不知道怎么吃。在地震中有 3 名学生因校舍倒塌而死亡，但学校已是当地最好的建筑。
新闻：fmn.cc/OzkL2N

2012 年 9 月 17 日，**江苏扬州**大学能动学院在军训场上开举行了九一八纪念活动。90 后新生们开展叠被子比赛，并用数百条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摆出“9．18”的字样，提醒大学生“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新闻：http://fmn.cc/Pu77uG

19 日下午，发生在 8 月 24 日的**哈尔滨**塌桥事故公布了调查结果，官方称塌桥的直接原因为车辆严重超载，间接原因为交警未发现事故车辆经过其管辖区域。据悉肇事车辆人员已经被移交警方。不过这一结果仍难以服众，此前有报道指出，中国 5 年内共塌了 37 座桥，仅 3 起被行政问责。
新闻：fmn.cc/PtNjJD
　　　http://fmn.cc/QnvBHZ

2012 年 9 月 13 日下午 13 时许，**武汉市**东湖风景区“东湖景园”还建楼 C 区 7-1 号楼建筑工地上的一台施工升降机在升至 100 米处时发生坠落，造成梯笼内的作业人员随笼坠落，截止下午 16 时 55 分，已发现 19 人死亡。在遇难的工人中，有四对夫妻，短短几秒内四个完整的家庭只剩下五个孤儿，19 个青壮年生命瞬间陨落，只留下老老小小和 87.9 万抚恤金。
新闻：http://fmn.cc/TNGWna
　　　http://fmn.cc/OGGwIu

9 月 13 日晚 10 时许，**深圳**罗湖区文锦渡口岸附近的罗湖公安派出所内响起枪声。随后，两民警被抬出。120 紧急送院抢救后，两人因受伤严重，抢救无效死亡。19 日晚有关部门向死者家属通报：两人当晚因工作矛盾发生争吵，罗湖公交派出所副所长杨旭持刀刺伤民警吴乾春，吴开枪打死杨旭，后开枪自杀。深圳警方将公布相关案情。
新闻：http://fmn.cc/Q6Ly21
　　　http://fmn.cc/Uf9lmh

2012 年 9 月 15 日，**南昌市**新建县西山镇举办庙会，庙会期间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前来进香。庙会工作人员为了避免外来香客被一些不法行乞者欺骗，在庙会门口建了铁栏，将行乞者围在里面，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送水送饭。这一救助点区长 50 米，全部用铁栅栏围住，行乞者中也不乏妇女和儿童。
新闻：http://fmn.cc/QnvM60

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日前接受美国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指出，国家副主席、将成为中国下一届领导人的**习近平**神隐 2 周，是因为稍早时游泳拉伤背部，现已康复。董建华还说，胡锦涛很有可能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会主席一段时间，但习近平接班的计划并没有改变。
新闻：http://fmn.cc/T1VIaP

近日**北京市政协**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我市互联网管理的建议案》，提出针对互联网特

点，整合现有资源建立全市统一的网络管理机构，提高薪酬待遇，吸引顶尖人才参与管理，同时扩大网评员队伍，通过技术手段，从源头上加强互联网管理。
新闻：http://fmn.cc/U6umPZ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铁道部**在对售票网站升级后，本周开始发售假期火车票。但民众发现，订票网站登录困难，新增加的 “排队”功能导致出票难，“双节”购票难过春运。有人建议铁道部同民航系统一样，放开高铁票务使之商业化，但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所研究员表示：“我们 12306 网站是非营利性质的，不会和商业企业合作，而且我们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
新闻：http://fmn.cc/Nz7vtC
http://fmn.cc/0GOIZe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宗洁、黄雯怡、黄海

校订：毕然

主编：方可成

配图：陈楚君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